

目 录

序 言	1
分歧同每一个人都有关	3
我們曾到莫斯科去会談	6
我們的观点的基础	15
什么构成修正主义?	22
怎样进行爭取和平的斗争?	31
“核彈”有沒有改变了馬克思主... 義?	41
本世紀最大的謊言	47
和平和民族解放斗争	49
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問題	58
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态度	64
結束語——在新西兰的任务	69

序　　言

这是一本关于共产党人的意识形态的小册子。由于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对两个重要的世界性的馬克思文件——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八十一党声明——的解釋存在着某些分歧，所以有必要发行这本小册子。这两个宝贵的馬克思主义文献是在世界各国共产党的领导經過长时间的討論后才产生的。它們一般地指出了朝着可靠的和平和社会主义的世界前进的道路。

新西兰共产党认为这两个文件具有重大的价值，它在这两个文件的进一步的帮助下发展了党綱——这就是我們拿到工作場所、拿到工厂和地方上去的那个綱領，也就是政府不讓我們在电台和電視节目中提出的那个綱領，在上次大选中资产阶级報紙实行封鎖而不予报道的那个綱領。

那么，为什么会在对这两个文件的解釋問題上产生这些分歧呢？我們对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着非常明确的看法，我們的看法是根据我們自己的經驗、根据我們对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認識和領会得出来的。这些看法并不是匆匆忙忙地得出来的，而是在对現在可以得到的越来越多的有关整个問題的材料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得出来的。

我們始終努力保持客观的态度，避免发表某些外国共产党领导人所耽迷的主观的激烈言論。我們的确曾希望这些分歧能在各国共产党的大家庭内部得到解决，而不要变成公开辯論的問題。如果过去在最初阶段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話，現在也就不需要发表这

本小冊子了。但是，由於种种原因——這些原因將在以後加以說明——我們早在一九六二年二月就向有關各方面提出的解決辦法並沒有被採納。資產階級宣傳機器抓住了這些分歧，加以歪曲和擴大，把它們作為阻擋全世界人民向和平和社會主義的愈來愈強大的進軍的一種辦法。它們把這些分歧看作是有助於支撐它們垂死的帝國主義世界的某種東西。

所有這一切，你們想必已經從電台廣播中聽到過了，在電視節目中看到過了，從我國的資產階級報紙上、從《真相報》以及其他這一類的出版物上讀過了。有人指責新西蘭共產黨的領導是中國的工具，並且贊成把世界核戰爭作為建立社會主義世界的手段。

由於這一切，有必要使凡是願意了解新西蘭共產黨看法的人，都能夠通過我們自己所闡述的來了解，而不是通過那些一向不僅激烈地反對共產黨人而且還激烈地反對一切富有鬥爭精神的人和進步人士的人們所說的來了解。

這就是寫這本小冊子的原因。

分歧同每一个人都有关

如果你不是共产党员，你可能会认为这与你毫不相干。也許你对于什么叫“意識形态”，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不管是这样，事实仍然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爭論的确是与你有关的。它同一切要求和平和进步的善良的人都有关系。爭論中的那些問題将决定：我們是不是繼續前进，通过消灭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来建立世界和平的可靠基础；新获得解放的前殖民地国家是不是繼續前进，走向社会主义，不受帝国主义的影响；在把帝国主义从前門赶走以后，新殖民主义是不是会从后門再进来。

在新西兰，这場爭論中用了許許多深奧的字眼和論證，它們涉及通过“和平方式”还是“其他方式”走向社会主义；涉及人民群众在“核世界”中是否仍然是決定性因素，或者說時間的因素是否已經使“領袖們”处于支配地位；还涉及帝国主义沒落的时代里资本主义世界的国家的性质；涉及議會在这个“新时代”里的作用。但是，实际上，这是早在我們本国的劳工运动初期就存在的問題。在共产党成立之前很久，在核时代来到之前很久，就在这些問題上发生了爭論。

在較早的时期，新西兰工党抛棄它原有的不多的馬克思成分，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漸进的不可避免性”（費边主义者曾經使用的术语）上面，寄托在走向社会主义的議會道路上面，寄托在“通过立法实现”社会主义上面。在这种过程中，除了在选举日拿鉛笔写选票以外，人民群众就变得无足輕重了。今天，在数届工党

政府执政以后，大家都知道我們所實現的并不是社会主义，而是一个大企业、壟斷資本一天比一天更加居于支配地位的社会。

在工业方面，在旧“赤色”劳工联合会于一九一三年衰落以后，劳工运动接受了劳資調解和仲裁就是前进的道路这种观念。他們指望資产阶级的国家能“公平对待”工人。归根結蒂，资本主义社会里工人唯一的真正的武器——不付出劳动力的权利、罢工的权利——当时被多数人抛棄了。

历史正在证明，这种态度是多么錯誤。工人們正在发现，越来越多的工人在对付壟斷資本时，都不得不使用他們最后的武器。我們发现，已故的劳工联合会主席芬·帕·华尔希先生在去世以前曾說：

“事态发展的趋势已經证明工党领导人諾德迈耶先生在上次劳工联合会大会上所說的那番話是不真实的。他当时說階級斗争是一种陈腐的观念，今天我們沒有階級，事实上，工人、农民、小商人和自由职业者的利益同大企业的利益是一致的。”

如果你对此加以思考，你就会发现，我們对于新西兰当前这些問題的态度，同我們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爭論問題的看法是以同样的原則为依据的。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就会了解这两者是直接相关的。因此，即使你觉得馬克思主义的名詞有些麻煩，也要記住馬克思主義是一門科学，它同其他各門科学一样，有它自己的專門术语。还要記住这本小冊子不仅是給新西兰人看的，它在国际上的发行量也会相当大。所以有許多問題必須比只在本地發行的书刊解釋得更充分一些。

如果記住了这些，那么，我們相信，考慮一下新西兰共产党领导的思想观点，就会在你的脑海中不仅消除資产阶级宣傳的谎言，

而且也会消除那些應該更为有脑子的朋友們的謊言。这会帮助你了解如何更有效地发展新西兰日益壮大的阶级斗争，使你明白在新西兰的政治战綫和劳工斗争战綫上的原則和策略。

我們會到莫斯科去會談

一九六三年八月底，新西兰共产党的一个代表团會到莫斯科去就意識形态分歧問題举行兄弟般的会談。这个代表团是应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邀请前往的；这个代表团的成員包括团长、总书记維·乔·威尔科克斯和团员、全国委员会主席默·威廉斯、政治委员会委员阿·奧斯特勒和政治委员会委员迪·沃尔夫。

你們大概知道这件事情，因为广播电台和報紙上曾經报道过。从那以后，許多非党的朋友曾經問道：“你們当时到莫斯科去究竟要談些什么？”我們想在这有限的篇幅內，像我們向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們說明的那样，尽可能清楚和确切地闡明我們的立場。

但是，首先，我們必須扼要地說明这种情况是怎么产生的，我們为什么会被邀请。

一九六二年二月，我們在听取了作为兄弟党代表参加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我党的乔·杰克逊所作的关于这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之后，就作出了某些决定。这些决定不仅是根据关于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进行情况的报告作出的，而且是根据一九六〇年年中以来我們所了解的一系列事件作出的。一九六〇年年中，新西兰共产党全国委员会委员杰·滿生曾作为兄弟党的代表出席羅馬尼亞党代表大会，他发现自己是在出席一次匆匆忙忙召集的世界各国党的代表會議——这是在其他許多党事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由苏共领导召集的。在这次会议上有人企图造成对中

國党和阿尔巴尼亚党的政策的全面譴責。杰·滿生明智而正确地拒絕表明新西兰党的态度，他說，他的党沒有授權給他处理这样的事情，因为他来的目的純粹是參加羅馬尼亞党代表大会。

我們的代表团在莫斯科举行双边会談的时候就指出，苏共領導事先沒有經過应有的集体討論就这样专斷地单方面采取行动，企图使自己的意見得到贊同，是多么錯誤。苏共中央书记米·安·苏斯洛夫說：

“首先，讓我們談談你提出的关于布加勒斯特會議的問題。威尔科克斯同志，难道你不知道，召开那次會議的原因是中共領導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发起了公开的进攻嗎？难道你不知道，早在一九六〇年四月，北京就出版了一本冠冕堂皇的名为《列寧主義万岁》的反馬克思主義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不仅由中国領導方面而且由形形色色的叛徒在全世界各地广为散发嗎？”

他們就是用这样的理由来为那官僚式的行徑辩护。然而，《列寧主義万岁》这本小册子，当时正被許多党作为党的学习材料。至于知道在羅馬尼亞代表大会之后将举行一次世界會議的問題，我們要向米·安·苏斯洛夫指出，当时許多党沒有派代表到布加勒斯特去——他們不知道——还有許多党沒有他們的中央領導核心出席，而如果要开一次真正具有代表性的世界會議，他們的出席是必要的。在塔斯曼海对岸的我們的兄弟党——澳大利亚共产党，就根本沒有代表出席。事实上，澳大利亚共产党是事后才非常感激地得到了我党代表杰·滿生的报告。

因此，看来当时許多人都不知道議程上有举行世界各国党代表會議这一項。

正是这类事情促使新西兰共产党领导对苏共領導的許多做法

以批判的态度提出了疑問，最后并对他們的許多“新的”理論和實踐同样也进行了批判的研究。

自然，这个問題在布加勒斯特并没有解决。这样一次匆匆忙忙召开的會議是解决不了这个問題的。因而，在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在莫斯科召开了正当地組織起来的世界各国党的會議，新西兰党正式派代表出席了这次會議。

但是，在苏共負責組織的这次會議上，我們也对苏共所采取的程序感到不滿。在这次会议上，正确地向所有的代表提出了一个文件草案，这个草案經過修改以后就成为由出席会议的所有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签署的八十一党声明。但是在会上也散发了苏联领导在布加勒斯特的声明。这是这次會議的正式文件之一。**但是，中国党的答复却沒有散发，而不得不从中國代表們那里取得。**由于这种做法，出席会议的許多党的领导人甚至沒有看到这个文件，更談不上研究这个文件了。苏共答复中共的另一个声明也散发給全体与会者。但是，中国的答复却又沒有散发。

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客观地研究一切能够得到的事实和意見。但是并沒有这样作。

更恶劣的是，当时(一九六〇年在莫斯科)苏共提供的材料中談到的关于从中国撤走技术人員甚至撤銷工业企业以及削減“援助”(注：一切物质“援助”都必須在以后付款)的原因，同苏联最近的材料——以及米·安·苏斯洛夫代表苏共中央向我們代表团說明的原因完全不同！苏斯洛夫对我们代表团說，中国领导拒絕接受技术援助和其他援助。但是，他所指的是一九六一年的事情——在中国已經有过以前这次經驗之后的事情。

我們不禁要为这些做法感到不安。

然后，召开了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提出从諸如免費供应

面包(从一九六四年起)和廢除所得稅这样微小但是重要的措施着手的“二十年走向共产主义”的綱領。我們曾經期望这个綱領将成为促进新西兰为实现社会主义而进行斗争的一个重大因素。到今天，事实已經证明不是那么回事，因为人們已經把注意力集中到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被突出的其他方面去了。資产阶级报刊对此热烈欢迎并且开始在把这个走向共产主义的綱領埋葬掉。

因为在这次代表大会上，甚至沒有一个阿尔巴尼亚同志出席来闡明阿尔巴尼亚党的立場，在这种情况下，却有人指望所有的代表都來譴責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领导是非馬克思主義的，是帝国主义的走狗。當我們的代表将这些情况向我們党汇报之后，我們拒絕这样作，并要求召开另一次世界各国共产党代表會議。

我們当时就认为，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公开會議上，公然对另一个兄弟党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领导进行猛烈的攻击，将会产生严重的后果。我們认为，这不仅使資本主义世界的敌人感到高兴，在我們自己的队伍中散布混乱，而且直接違反我們世界各国党关于应当如何处理我們运动中的分歧的决定。

我們指出这一点的时候，沒有談到阿尔巴尼亚党的立場的是非曲直問題。他們可以在适当的时间和地点在我們世界运动的内部来为自己讲话。作为一个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他們有这种权利。

說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已經公开攻击了苏共领导，继而引用諸如《苏格兰人报》和其他資产阶级报纸妄加猜测的文章来为自己辯解，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些妄加猜测的文章是一回事，資产阶级利用苏共在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这样的代表大会上对另一个党进行的公开譴責所发动的宣傳攻击，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在像新西兰这样的国家里，在我們队伍之外的所有的人和我們队伍

之內的許多人的心目中，這些攻擊成了人們注意的唯一的問題。而蘇共走向共產主義的綱領完全被人忘記了。

（的確，從現在已經公開的有關蘇聯的農業和工業的問題中，可能產生這樣的疑問：整個概念是否提出得為時過早。但是這個問題已超出了這本小冊子的論述範圍。）

要求參加蘇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會的其他兄弟黨的代表譴責阿爾巴尼亞黨的領導的這種做法是錯誤的，當時這些代表沒有被授權這樣做。這樣一件世界範圍的事，只能由一次世界性的會議來決定。我們認為這種做法是非常錯誤的，是違反我們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〇年的世界性的決議的。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聲明是怎麼說的呢？

——一九五七年莫斯科宣言說：“會議參加者交換意見以後，得出了結論，認為在現代條件下，除了舉行領導人員的雙邊會談和相互交換情況以外，在必要的時候還應該舉行更廣泛的共產黨和工人黨的會議，以便討論迫切的問題，交流經驗，了解彼此的觀點和立場，協議為和平、民主和社會主義的共同目的而進行的共同鬥爭。”

——一九六〇年的莫斯科聲明說：“所有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都是獨立的、平等的，它們從本國的具體條件出發，遵循著馬克思列寧主義原則制定政策，並且相互支持。每一個國家的工人階級事業要獲得成功，需要所有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的國際主義的同情支持。每個黨都對本國的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負責，都對整個國際工人運動和共產主義運動負責。

“共產黨和工人黨根據需要舉行會議來討論迫切的問題，交流經驗，互相了解彼此的觀點和立場，通過協商途徑得到一致的觀點，協調在爭取共同目標的鬥爭中的共同行動。

“当某一个党遇有同另一个兄弟党的活动有关的問題时，由这个党的领导方面向有关党的领导方面提出，必要时进行会談和协商。”

这些做到了沒有呢？我們說，沒有。的确，他們也曾經作过一些嘗試要同阿尔巴尼亚领导人举行会談。但是，他們有沒有根据所有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都是独立的、平等的这个精神来作呢？

而实际上在这以后出現了怎样的情况呢？赫魯曉夫代表苏共领导集体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讲了下面这番話，而且从那时以来一再地重复这些話：

“如果阿尔巴尼亚的领导人珍視本国人民的利益和阿尔巴尼亚的社会主义建設事業，如果他們真正希望同苏共、同所有兄弟党友好，他們就应当放棄自己的錯誤观点，回到在社会主义兄弟大家庭中團結和密切合作的道路上来，回到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團結的道路上来。”

这是什么意思呢？肯定是这样的：在举行双边性质的会談以前，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就必须声明，自己在一切有爭論的問題上都是錯誤的。在这里，苏共的态度背离了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所有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都是独立的、平等的”，任何这种观念都被拋到九霄云外去了。既然話全說了，事情都做了，那么，按照苏共领导人自己的說法——姑且不論这种說法是对还是錯——在他們看来，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在理論和实践上的立場也正是十年或者十五年前苏联的立場。

那么，他們是不是能够說，在斯大林时期，从三十年代起，布尔什維克党已經不是一个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了呢？

再来談談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作为这次代表大会的結果，苏共中央在給我們党的信中和在其他許多場合都曾經說：全世

界各国党都譴責阿尔巴尼亚領導是非馬克思主義的，搞分裂活动的，等等。事实决不是这样。所有各国党并不是个个都表示了这样的态度。

我們并不想在这些問題上使你們生厌，但是我們认为這些問題是重要的。事實是，一切經驗都表明，錯誤的實踐是从不正确的理論中产生的，而且事實上它是以不正确的理論为根据的。

苏共领导人和其他党的某些领导人所作的大量的斷言，使我們严重忧虑；我們认为，这些話不是以事实作根据的。馬克思主义者必須永远从事实出发，必須从已知的情况出发，而不是从某人想望的情况出发。社会民主党人为了适应自己的目的而采取后一种做法，但是我們是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們可以举出一个例子來說明这种在我們看来是不正确的态度。我們来引述一段話：——

“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使他們同苏共、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尖銳化到极点，——”（一九六三年六月二十一日赫魯曉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的讲话）

不錯，对于中国领导人及其所做的事，他們可以有自己的看法。但是，他們說什么“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就不正确了。这是不确实的。人們說話如果离开了已知的事实——不論他們多么不喜欢这种事实——他們就开始踏上了危險的道路。

我們作为一个党，是以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为依据的。对于我们來說，这些文件仍然是有效的，任何一个党也沒有任何权利来改变其方向或重点。只有通过我們世界运动的集体决定才能这样作。看来有許多党在独自修改这些文件，断章取义地摘出一些片段来适应他們自己的想法，使文件遭到歪曲。

我們认为，这样做的党当中包括苏共。

正是因为看到这一点，我們党的政治委員会才决定，不能照着

其他一些党在苏共中央委员会的指使下所做的那样譴責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領導。相反，我們要求为再召开一次世界各国党的會議作准备，以便按照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的决定来考慮全部有爭論的問題。宣言和声明中的有关部分，我們在上面已經引述过了。我們建議，应当由最直接有关的方面举行双边会談，以便为召开一次世界性會議創造适当的气氛，一种不会导致主观的攻击而会对一切問題作客观的批評和自我批評的估計的气氛。

因此，我們写了信給苏共中央委員會、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員會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員會。

一連串的信接踵而来。中国党同意我們的意見，他們自己也提出了有些相似的建議。后来，苏共中央委員會建議需要召开一次世界性會議，但是出发点是他們的意識形态絲毫不成問題，召幵會議的目的是要在全世界範圍內更有效地把他們的意識形态付諸實踐。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員會当时对于同苏共領導举行會議是否能取得任何有价值的成果仍然表示怀疑。

当苏共中央終于发出邀請要新西兰共产党派一个代表团去莫斯科討論分歧的时候，情况就是如此。这个建議恰好是在新西兰共产党一九六三年复活节举行代表大会之前來到的。

同时，新西兰共产党領導对我们世界运动的形势、对意識形态分歧的严重性进行了很多思考，这种分歧在各方面的活动中也像在理論刊物和其他出版物上一样变得日益明显了。

我們得出了我們的結論，这个結論不是通过別人教我們怎样考慮問題而得出的，而是通过我們自己在資本主义世界中的斗争經驗、通过我們自己对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解而得出的。

我們斷定（这种看法得到了我們党上次代表大会的批准），苏共領導在理論上和实践中都已經表明，他們基本上已經离开了馬

克思主義的观点，站到修正主义的立場上；如果不加以糾正，就会导致完全放棄馬克思列寧主義，雖然他們也像从前的修正主义者一样还在使用馬克思主義的詞句。

这个判断并不是輕易或愉快地作出来的。这是經過了深思熟慮，經過了一些痛心的时刻才作出来的，因为我們多少年来一直忠誠于蘇共領導，这种忠誠差不多常常可以追溯到童年时代。这不是反蘇立場。苏联人民和他們的共产党必定会向共产主义前进，但是在尼·謝·赫魯曉夫的領導下，修正主义的滋长若得不到糾正就会起很大的阻碍作用。的确，在全世界範圍內，这种修正主义的影响已經很严重，起了阻碍作用，这是由于蘇共对各国党有着特別的影响，这种影响可以追溯到列寧和一九一七年偉大的十月革命时代。

尼·謝·赫魯曉夫在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作的关于斯大林的秘密報告（據我們了解，在苏联還沒有发表过，但是《紐約时报》在一九五六年非常迅速地在特別增刊上发表了）尽管不公平，它本来应当把人們认为蘇共領導不会犯錯誤的观念永远打消掉了。从某些人今天的态度和言論看來，人們很可以問一問：“打消了沒有？”当然，任何相信哪个党或者哪个领导人不会犯錯誤的观念都是完全非馬克思主義的——道地的唯心論——但是这种观念还是存在着。

我們再說一遍：像我們目前这样在意識形态上同蘇共領導持不同的意見，并沒有改变我們对偉大的苏联人民，对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的光荣历史和成就的尊敬和热爱。

我們的观点的基础

除了对待兄弟党关系方面采取的工作方法和組織方法問題外，我們在哪些問題上有不同的意見呢？我們有不同意見的問題都是根本性的，天天影响着我們每一个人的。

在今天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这些字眼經常不断地出現。一些党是在这样的前提下制訂它們的政策的，即：我們处在社会主义胜利和帝国主义衰落的新时代——这样一个时代事实上使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某些基本原則变得过时了，或者不再像过去人們所理解的那样，是决定性的因素了。

这特別适用于对待如下一些重大問題的原則上和策略上的态度：

——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方法。

——国家的性质。

——爭取世界和平的斗争。

——民族解放运动以及它在爭取和平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中的作用。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在意意识形态方面的立場（以前大家都认为这是危險的修正主义倾向的例子，必須与之坚决斗争到底）。

——社会民主主义。

这些分歧总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每一个国家的每一个人。因此，客观地研究这些分歧就具有重要意义；进行客观的研究，是

为了澄清是非，在意识形态一致的原则基础上达到团结。这种意识形态的一致则是通过以正确的辩证观点来研究一切有关的已知因素而取得的。如果认为，给维护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人们简单地扣上“教条主义者”的帽子就解决一切争论了，那是无益的。基本的重要出发点是让所有的人都认识到：没有任何领导人、没有任何党能够说，他们在一切事情上和一切方面都永远是正确的。但是我们的代表团在莫斯科同苏联同志们会谈的时候，就认为在他们的态度中内在地存有这种观念。

当然，在这些深奥的理论问题上，我们党并不认为我们在一切事情上都是正确的。但是，我们出席莫斯科双边会谈的代表团，我们的政治委员会和我们的全国委员会，在重新考虑这整个问题的时候，更加相信在那些极端重要的问题上，我们的态度是正确的。否则，就不会发行这本小册子了。

我们党过去完全赞成，现在仍然赞成当时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党通过的一九五七年宣言。我们党过去完全赞成，现在仍然赞成八十一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一九六〇年在莫斯科举行的会议结束时全体签署和发表的声明中再次作出的同样的决定。那项重要的意识形态的决定是：修正主义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主要危险。我们还毫不犹豫地说，事态发展证明，这个观点不仅是正确的，而且自从一九六〇年以来，这个危险还大大地增长了。

列宁在世的时候是怎样谈论修正主义的呢？（我们要记住，列宁曾以他毕生大部分精力对俄国的马克思主义队伍中以及当时组织良好的第二国际的各社会民主党派内修正主义的滋长进行斗争。）关于修正主义，伟大的列宁说：

“临时应付，迁就眼前的事变，迁就微小的政治变动，忘记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忘记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整个资本主义

演变的基本特点，为謀取实际的或可以設想的一时的利益而牺牲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这就是修正主义的政策。”

我們认为，目前以尼·謝·赫魯曉夫为首的苏共領導已經站在这样的立場上。这样的形势势必深刻地影响其他許多党，并且把它們导向修正主义的观点，这并不是出乎意料的。我們再說一遍，由于自从第三国际成立以来“列宁的党”就有着广泛的影响，苏联党現在仍有极高的威信。

我們今天看到，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某些重要的基本真理正在被篡改，或者被认为是过时了，我們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这一情况毫无必要地給阶级敌人增加了力量。如果听任其发展下去，那就会肯定地导致公开的背叛，一如考茨基^①的修正主义在列宁时代所做过的那样。因此，新西兰共产党在这个問題上采取了这种原則的立場。

我們和八十一党声明一样，也認識到教条主义的危險。但是今天教条主义的最典型的例子，大概是一些党的領導中的那些人，他們不加批判地接受尼·謝·赫魯曉夫等人所說的一切，他們不让他們的党员知道或有机会閱讀和研究各种不同的意見。不幸，在一些党内正在发生这种情况，但是我們党的領導已經尽我們的組織力量所及，向党员們介紹了各种观点。例如，我們党的每一个党员都得到一份我党代表团在莫斯科双边会談上的发言、米·安·苏斯洛夫代表苏共中央委員會所作的发言全文以及我党總书记維·乔·威尔科克斯在代表团从莫斯科回来后向全国委员会會議所作

① 他是二十世紀初德国一个居重要地位的馬克思主义者。他背叛了德国工人阶级，支持德国皇帝的战争努力，咒罵俄国革命，墮落到全面支持资本主义的立場。与此同时，他却仍然高喊他的新理論是馬克思主义，而馬克思自己早先的論点則已經过时。

的報告。

在認識到教條主義的危險的同时，我們還不安地看到蘇共領導不再認為修正主義是主要危險了。米·安·蘇斯洛夫說，“自从一九六〇年以来，許多事情发生了变化”。他們顯然認為，在修正主義和教條主義問題上，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聲明不再是正確的了。从下述的引語中就可以看出我們所講的話的意思，

“蘇共過去和現在都既同修正主義也同教條主義和宗派主義進行堅持不渝的鬥爭。而有些人却只片面地強調同修正主義鬥爭，而且有時還把創造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說成是‘修正主義’，從而給共產主義運動製造明顯的混亂。……以教條主義的態度來對待共產主義運動最重要問題的解決，是最嚴重的錯誤的根源。”

——《真理報》一九六三年一月七日編輯部文章

“在目前情況下，‘左傾’機會主義的危險並不小於修正主義”。

——鮑·尼·波諾馬廖夫一九六三年四月二十二日在紀念列寧誕生九十三周年集會上的講話

“一九六〇年兄弟黨會議警告說，如果不同宗派主義和教條主義進行始終不渝的鬥爭，它們也可能成為某些黨在這一或那一發展階段上的主要危險。最近時期的事件發展表明了這些結論的遠見性。……左傾機會主義……在目前其危險並不小於修正主義。”

——《真理報》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五日社論

“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力量在於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忠實。蘇共過去進行了、今后仍將進行反對背離馬克思列寧主義、反對任何機會主義的鬥爭。我們堅

定地遵循一九六〇年声明中的論点，这些論点指出，必須进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的两条战綫上的斗争。声明正确地指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主要危險是修正主义，同时也指出必須进行反对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坚决斗争，如果不同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进行始終不渝的斗争，它們也可能成为某些党在这一或那一发展阶段上的主要危險。

“我們党本着在馬克思列宁主义原則的基础上加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的利益，今后仍将进行坚决的斗争，既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也反对其危險目前并不小于修正主义的左倾机会主义。”

——引自苏共中央一九六三年三月三十日給中共中央的信

如果从这些引語来看，他們的态度还显得有些模棱两可的話，我們只能提醒你們讀一下列宁所讲过的关于修正主义者的一些話。（見本书第16—17頁）

总之，一九六〇年莫斯科八十一党声明是这样說的：

“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进一步发展的利益，要求今后繼續在两条战綫上进行坚决斗争——反对仍然是主要危險的修正主义，也反对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

請客观地把这一段話同引自《真理报》社論的那段話或上述其他引語比較一下吧。

我們认为这是危險地改变了着重点。这样做，鼓舞了各地的修正主义者，鼓励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叛徒——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领导人，并且，一般地說，還在我們自己的队伍中造成了一些混乱和分裂。它导致了这样一种局面，誰要指出修正主义的倾向或者真实的理論根据，立即就被攻击为“教条主义”。明显

的事实是：世界各地的許多党的領導人都是根据“教条主义”、“左傾机会主义”是今天主要危險这种臆想行事的。

我們认为情况不是这样。我們持相反的意見，这一点已經說明了。无论如何，这种臆想，或者說这种观点，无论在字句上还是在政策上都是違反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的提法的。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清楚地說明主要危險在哪里。有些人企图为这种方向上的改变辯解，說什么在我們生活的新时代里所产生的一些新因素改变了形势，这种辯解是毫无道理的。

自从一九六〇年我們經過长时间集体討論后通过決議以来，沒有出現新的主要因素。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明确指出我們生活的时代的性质，并且概述了我們运动前进的一般道路。新西兰共产党在實行中坚持遵守这一点，并且期望其他馬克思列寧主义政党也这样做。

这种改变意味着什么呢？逐步放松对修正主义、右傾机会主义的打击，終将导致什么呢？我們认为，自从苏共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以来的这几年中，苏共领导一直在发生这种改变。这种趋势不仅导致錯誤地过分強調我們的世界运动中的教条主义危險，把每一个批評都夸大为教条主义倾向，实际情况比这更恶劣。这种趋势不可避免地导致修正主义思想的滋长和接受这种思想。这种趋势，从一九五六年不公正地批判斯大林，相当快地发展到把斯大林贬得“一文不值”，抹煞他的积极成就，硬說苏联在斯大林执政时期虽然建設社会主义，却实行了“举世未聞的最残酷的和血腥的专政”。

难道不正是在苏共二十大进行的这种攻击——我們已經說过它是不公正的——大大帮助了当时新西兰共产党內已經存在的修正主义的司各脫小宗派嗎？在他們不仅攻击党的政策和領導，而

且攻击关于一个馬克思列寧主義政党的組織形式的公认的基本原則——党的章程和規則——的时候，《紐約时报》刊印的那个秘密報告不是成了他們的“聖經”嗎？

不論斯大林犯过什么錯誤，他不是修正主义者。因此，現代修正主义者在他逝世后同他发生誓不两立的冲突。“个人迷信”变成了一切麻煩、一切失敗的根源——不仅是苏联國內农业或其他方面失敗的根源，而且是一切地方一切錯誤和一切困难的根源。这一直是近年来圍繞所謂“个人迷信”問題而采取的态度，尽管事实上斯大林逝世越来越久远了！这种态度是什么問題也解决不了的，但是由于这种态度是从一个捏造的前提出发的，因此它会导致进一步的失敗和挫折。占主导地位的是歇斯底里，而不是辯證的、客观的馬克思主乂的态度。这样就为修正主义的得势大开方便之門。

如果各共产党之間在某些理論問題方面产生了分歧（当然这种分歧会不时产生），那么显然要責怪中国人，因为他們奉行“对毛的迷信”。对朝鮮党及其领导人也进行了类似的指責，同时还对其他的人进行影射。对爭論中的那些問題并没有认真地加以考慮。占上风的是主观，而不是客观。

什么构成修正主义？

現在讓我們來看看一些具体的重要方面，看看苏联共产党和一些其他共产党的领导今天在理論上和實踐中对于这些方面是怎样說的和怎样做的。我們尽量說得簡短一些。

关于領導劳动群众走向社会主义的問題，我們对这一点感到十分担心，即：今天在我們馬克思列宁主义运动对世界总的看法中，有人过多地強調了并不存在和平可能性的地区的和平可能性，而对其他方法則強調得不够。如果我們的看法是正确的，那末說今天在存在着从民族解放斗争发展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的国家里有一种明确的起阻撓作用的影响，这难道不是事实嗎？在資本主义世界，这种影响到处侵襲我們各国党的革命核心，为社会民主党的思想的滲入开辟道路。

其次，我們还认为，有人过多地強調和信赖社会主义世界各国的物质进展对各国人民思想的影响，而对促成进步的真正核心，即資本主义地区、殖民地地区和新解放地区的群众积极性，则強調得不够。

在我們看来，进步的基础仍然是阶级斗争，非社会主义世界的阶级战斗。我們同意，社会主义的胜利，苏共綱領的胜利实现等等是重要的，并且将产生有利的影响。但是难道不应当把它们看成是次要的事情嗎？

我們并不否认在一定条件下和平过渡的可能性。但是，除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头几年中英勇和胜利的紅軍曾經到达或者逼近

因而產生了压倒一切的影响的地区之外，历史上还没有和平过渡的第一个先例。然而我們知道，一些党实际上已經得出，或正在得出这样的結論：它們的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唯一道路是和平的道路。

对于这种严重的修正主义发展，我們认为目前的苏共领导起了促进作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概念一直在发展和扩大，直到造成了上述局面。就我們所知，苏共沒有对这种发展提出过任何认真的批評，而最近却不断地对认为和平过渡在大部分非社会主义世界里只不过是一种幻想这种想法进行正面的攻击。

的确，认为我們非社会主义世界所有的人可以舒舒服服地騎在社会主义世界的背上走向社会主义这种思想受到了鼓励，从而損害了依靠群众这个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

为了說明我們认为这种概念是如何形成的，我們只簡短地引述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苏共綱領中的一段話。

“当苏联人民享受到共产主义的幸福的时候，世界上又会有几亿人說：‘我們贊成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的思想不是通过同其他国家进行战争的途径，而是用更完善的社会組織的范例，用生产力的蓬勃发展，通过为人們幸福安宁的生活創造一切条件，来爭取人民群众的思想与心灵的。”

如果这不是意味着只要我們有耐心，我們就可以袖手不动，因为主要因素将是阶级战斗已經获胜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范例，那么又意味着什么呢？这是否能赢得资本主义的、非社会主义世界的群众的思想与心灵呢？由资本主义社会的性质而产生的阶级斗争到那里去了呢？

我們认为，这样过分強調一个方面，可能是很危險的，并且可以导致錯誤的結論。但是，我們同时要着重指出，我們并不低估一

九一七年革命对于世界革命运动发展的极为重大的影响；也不低估从那时以来苏共领导、党员和苏联人民这些年来所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設工作以及他們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所作出的牺牲。

苏联的一位主要理論家波諾馬廖夫同志一九六三年四月二十二日在紀念列寧誕辰九十三周年的大会上发表讲话說：

“列寧主義把和平共处政策同进一步革命地改造世界的活动結合起来。在和平的条件下，社会主义大家庭日益强大，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优越性充分表現出来。保卫和平与在世界政治中維护和平共处的原则，根本不会削弱世界革命的进程，只会加速这个进程。正是在和平共处的条件下，古巴革命取得了胜利，从而继欧亚两洲之后，社会主义在世界第三大洲——美洲获得了一个据点。”

在某种程度上我們同意。但是古巴革命是在冷战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而且是通过古巴人民的武装斗争赢得胜利的，这难道不是事实嗎？（附带說一句，我們了解，不幸的是，这場斗争既不是古巴人民社会党領導的，而且在一个长时期中也沒有得到这个党的支持。）在我們前面引用的一段話中所強調的，是和平共处的条件，而沒有提及起作用的有效因素——武装斗争。阶级斗争是每个国家內的根本因素，在这种观点中看不到这个因素。

在我們党看来，在每个国家里，工人阶级政党在为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斗争中，总是希望和平地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的。但是它在任何时候都必须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积蓄革命力量的艰苦工作上，必须为非和平过渡作充分准备。这样，如果統治阶级拒絕接受人民的意志而对革命采取武装鎮压，那么工人阶级政党就能狠狠地予以还击。坦白地說，我们认为，指望得到反动統治阶级完全而自願贊同的和平过渡，这将不可避免地要挫伤人民的革命意

志和葬送无产阶级革命的事业。我们认为，以为统治阶级会自动交出政权的幻想是一种现代形式的社会主义民主义。

关于这方面的一些问题，一九六〇年八十一一个党的声明是怎么说的呢？我们简短地摘引几段：

“世界舞台上新的力量对比，为共产党和工人党解决它们所面临的争取和平、民族独立、民主和社会主义斗争的历史任务，提供新的可能性。

“各国共产党根据本国的具体历史条件和社会条件，并且考虑到国际局势，来确定革命的前景和任务。它们进行忘我的斗争，争取在当前的条件下尽一切力量保卫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利益，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扩大人民的民主权利和自由，而不把这些事情拖延到社会主义胜利的时候。工人阶级及其革命的先锋队认识到，他们自己肩负着为使本国人民摆脱资本压迫而斗争的主要重担，他们将在本国政治、经济和思想生活的一切领域里，向压迫者和剥削者的统治展开越来越有力的进攻。在这一斗争的过程中，锻炼群众，为推翻资本主义、争取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进行决战创造着条件。”

一九六〇年的声明把事情说得恰如其分。各国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必须根据本国的条件肩负起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重担。声明如实地指出了社会主义成就的影响所起的辅助作用。声明没有修改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基本概念：群众在自己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领导下，是在本国反对资本主义、争取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斗争中的决定性因素。

的确，米·安·苏斯洛夫代表苏联共产党在莫斯科对我们的代表团说过，苏联共产党主张根据当地的条件采取一切过渡的方式。别的人也的确多次谈到过这一点。但是，事实仍然是，一九六

○年的大爭論是關於應該比一九五七年宣言更多地還是更少地強調和平的過渡方式問題。主張更多地強調這一點的觀點，是由蘇聯共產黨領導、特別是尼·謝·赫魯曉夫帶頭提出的。意味深長的是，由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起草的一九六〇年八十一個黨會議聲明的初稿，只談到一種方式，即和平方式。別的黨不得不進行鬥爭來把它修改成後來樣子。了解到這一切之後，人們不得不對他們的態度提出疑問。

其次，我們感到擔心的是，我們認為有人未能看到，隨着條件的變化，正在發展中的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風暴中心不可避免地已經轉移了。在一九一七年，風暴的中心是在俄國和歐洲。今天難道亞洲、非洲和南美洲在某種程度上不是風暴的中心嗎？

這裡，我們想從列寧的報告中摘錄幾句話，雖然不是直接適用，但是在某種程度上是恰當的。

“社會主義革命不會僅僅是或主要是每一個革命無產者反對本國資產階級的鬥爭。不會的，這個革命將是受帝國主義壓迫的一切殖民地、一切國家和一切附屬國反對國際帝國主義的戰爭。”

“今後，我們蘇維埃共和國將把覺醒的東部各族人民團結在自己周圍，共同去進行反國際帝國主義的鬥爭。”（列寧：《在全俄東部各民族共產黨組織第二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

今天在我們世界運動中提出來關於資本家將和平地投降——不僅是作為一種策略手段而作出讓步，而是面對著議會的多數或者其他保證要向社會主義前進的和平組織機構交出國家政權——的總的概念，簡直不適用於今天世界革命風暴的中心。它是否適用於別的地方，對這一點我們也表示懷疑。這個概念會產生什麼結果呢？要末是接受這種概念，而使有效的鬥爭開展不起來，因

为整个状况要求准备和进行武装斗争。要末是这些国家的同志反对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的这种解释。实际上在许多国家里正在发生后面这种情况。

老实说，我们觉得，在当代世界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式问题，往往是更多地由被认为是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当前国家政策、而不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思想来决定的。这一切的背后似乎贯穿着这样一个主题：它们需要同帝国主义长期保持和平的关系，因此“不要去刺激野兽”。建议在某些尚未攻克的重要帝国主义堡垒里准备和进行武装斗争，那是非常“刺激人的”。因此，我们在听到有人大谈什么“明智的帝国主义者”正被说服接受和平投降的同时，帝国主义者实际上却在继续采取一成不变的强硬路线（很难说服越南南方人民相信帝国主义正在变得明智了！）。

这种理论家是不是始终考虑到世界各地的情况仍然各不相同，因此走向社会主义的方法也必然有所不同呢？在新西兰，武装斗争目前还没有提到日程上来，必须运用其他的斗争形式。但是我们决不能认为任何其他的人都应该运用我们目前所采取的方法，也决不能单凭我们自己的处境来作出判断。

在新西兰工人运动中，我们共产党应该以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为总目标，在反对垄断资本、保卫民主权利的斗争中和各种形式的日常的经济和政治斗争中，给予积极的领导。我们党，作为工人阶级的政党，始终希望实现和平地过渡到社会主义，但是必须时时刻刻警惕这样的想法：认为这是唯一的或者甚至是很可能的道路。我们党必须把主要注意力放在提高革命觉悟上，同时它本身必须为非和平的过渡作好充分的准备。

这样，随着条件的发展，当争取实现社会主义成为新西兰的一个迫切问题时，如果统治阶级拒绝接受人民的意志并对革命进行

武装鎮压的話，我們黨就將隨時狠狠地予以回击。

我們认为，如果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党陷入把一切希望寄托在得到反动統治阶级完全欣然贊同的和平过渡上的那种境地，那么它就将挫伤人民的革命热情和葬送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正如早期的修正主义者考茨基和伯恩施坦在当年大卖力气干的那样。我們认为，所有的共产党人都應該重新研究一下那个时期。因为，难道不正是那些修正主义理論家，在世界規模上发展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造成分裂，結果才成立了第三国际？我們极其严肃地提出這一建議，因为在我們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运动中，我們正面对着世界規模的分裂。我們希望我們能吸取过去的教訓并避免这样的发展。

但是苏共中央的代表們就我們对事情的看法是怎么說的呢？現在把他們的話引述如下：

“我們完全不同意你們的如下論点：社会主义革命的風暴中心（如你們所称的）已經轉移到东南亚和南美。这不仅是对莫斯科各次會議文件的重新估价，而且是对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的修正。这是对工人阶级的力量和可能性缺乏信心的表現，是对世界工人阶级及其主要产物——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领导权缺乏信心的表現。如果風暴的中心已經轉移到东南亚和拉丁美洲，那么，工人阶级的历史作用在哪里呢？作为工人阶级的产物的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地位和作用又在哪里呢？我要重說一遍，你們的論点完全修正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

“为了弄清楚这个問題，我願意提醒你們看看八十一個党的声明是怎么說的。我們时代的中心因素是国际工人阶级及其主要产物——世界社会主义体系。这些因素是爭取和平、

民主、民族解放、社会主义和人类进步的斗争取得胜利的保证。

“两个对立的体系——社会主义体系和资本主义体系之间进行斗争的领域，是世界革命进程的主要战场。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则是我们时代最巨大的革命力量。为什么你们要反对这个明显的事呢？对这一事实的了解，决不会贬低你们所提到的那些地区的人民的革命斗争的重大意义，而是有助于了解那场斗争及其前景的真实情况。

“对我们时代的特点作出不正确的估价，使你们对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进行修正。”

这确实是重要的谈吐。我们竟对马克思主义作了根本性的“修正”了。然而我们是怎么说的呢？我们说：

“同志们，我们重说一遍，我们所担心的是，我们认为有人未能看到，随着形势的变化，发展中的世界社会主义革命风暴中心已经不可避免地转移了。在一九一七年，风暴中心是在俄国和欧洲。今天，在某种程度上，难道风暴中心不是在亚洲、东南亚和南美洲吗？”

同时也让我们指出，尼·谢·赫鲁晓夫本人讲过这样的话：

“民族解放运动正在给予帝国主义以日益沉重的打击，有助于加强和平和加速人类的社会进步。目前，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是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的最重要的中心。”

——一九六〇年九月二十三日第十五届
联大进行一般辩论时发表的讲话

我们只好让苏斯洛夫同志和赫鲁晓夫同志他们自己去争个明白了。我们坚持我们所提出的主张。人们所注意的是薄弱环节，而今天帝国主义链条上的这些薄弱环节正是我们所指出的那些地

方。我們並沒有背離我們世界運動的總路線，我們並不否認工人階級在帝國主義堡壘里的作用。

我們還可以補充說：在蘇聯黨領導人的最近的文章和講話中，可以找到許多這種普遍的混亂和矛盾。我們要說，這是很自然的事，如果我們的下述看法是正確的話。我們的看法是：他們在理論上和實踐中已經不再是把他們的觀點堅定地建立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礎上，而是雖然有時也滿口革命詞句，實際上却已讓某些危險的修正主義思想滲透進去了。

馬克思主義者早已拋棄了那種認為社會主義勢必首先在高度工業化的國家裏實現的陳舊思想。歷史證明，進展是出現在帝國主義的最薄弱的環節上。在一九一七年，當時的許多修正主義者反對俄國革命，其理由是：由於“沙皇俄國的落後狀態”，革命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他們借口把希望寄托在革命力量還沒有強大到足以突破的“資本主義的優點”上，實際上是反對革命——反對社會主義。

我們的蘇聯同志們應當仔細地看看這一方面，而不要指責別人背離了總路線。

社會主義世界的巨大進展及其普遍影響絲毫也沒有改變這樣一個事實：即為了繼續前進，我們應當指望資本主義世界較薄弱的地區正在鬥爭和組織起來的人們，並且向他們提供最大限度的援助。我們應當，並且也能够做到這一點，而絲毫不會削弱主要工業國家的鬥爭。這兩者是攜手並進的。

誰看不到這一點就是修正主義者。

怎样进行爭取和平的斗争？

今天，各国党都說它們同意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莫斯科声明关于爭取世界和平的斗争的策略主張的提法，这是就我們的党的活动來說的。大家都同意，如果在世界范围内吸引最广大阶层的群众开展有效的斗争，即使帝国主义仍然存在，世界战争也是可以避免的。但是，当我们考慮到爭取和平的斗争應該采用什么方法以及它涉及哪些問題时，分歧就开始产生了。

我们认为，这些分歧的产生是由于有些人沒有认识到：对馬克思主义者來說，爭取和平的斗争首先是一場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帝国主义制度本身就包含着现代战争的根源。在爭取和平斗争的发展过程中将采用各种方法，千百万人将被吸引到这場斗争中来，他們当时不会认识到这一点，但是从根本上說，他们的行动不仅是为了爭取和平，而且是針對着帝国主义的。

如果我們这样看問題，我們就不会认为爭取和平的斗争只局限于某些方面，不管这些方面是多么重要。我們把它看成是一个全面斗争，其中包括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之間关系的国家政策的基本特征的和平共处政策；包括吸引帝国主义世界的群众——通过他們的工会和政治团体，并且通过新的形式——参加有組織的爭取和平的斗争，包括自然而然地扩大到殖民地和新解放地区的各种类型的和平运动。

但是是否應該到此为止呢？有些人似乎是这样想的。我們怀疑，依靠群众这一点是否还被看成是斗争的重要基础；在尽可能广

泛的基础上把他們吸引进来这一点是否还被看成是进行有效斗争的目标。这个运动似乎往往依靠吸引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参加并依靠他們来领导，它的组织也是以这些人为基础的。当然，他們可以起作用，但是这种作用是次要的，而不是主要的；同样地，帝国主义国家政府和社会主义国家政府之間就有关和平的各种問題所达成的協議是有价值的，但是与群众对于爭取和平的觉悟的提高，从而意識到必須采取有組織的行动这种情况相比，却是次要的。

根据斯德哥尔摩和平大会的报告，在某种程度上根据随后在莫斯科举行的大会的报告，我們所得到的印象是，上述做法上的缺陷是一清二楚的。根据我們的观点，更糟糕的是这个事实，即作为爭取世界和平斗争重要組成部分的反帝民族解放斗争的重要意义，不是被忽視了就是遭到反对。但是我們要說，这是爭取世界和平斗争的重要部分。

我们认为，在这方面产生的混乱——如我們在前面說过的——是由于沒有能够認識到，实质上，爭取和平的斗争是在一切战线上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斗争；沒有能够認識到，在我們的新时代，帝国主义的本性沒有改变；沒有能够認識到，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就有发生帝国主义战争的危險。

真正爱好和平的帝国主义者是没有的。从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这样的事情本身就是矛盾的。我們要問，帝国主义头子有时候不是錯誤地被划为这一类人么？例如，艾森豪威尔曾被赫魯曉夫称为“爱好和平的人”。此后，对于肯尼迪也說了些类似的話，毫无疑问，这种話不久也将应用到約翰逊身上。

在这里，我們必須說，我們认为，今天我們的世界运动在这个和其他重要方面的某些分歧，是由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首先

提出的那些概念所产生的；后来许多人把这些概念这样地加以发展，以致当我们估計我們新时代的时候，我們不禁要問，着重点是不是有点紊乱了。这种“新”是真的新呢，还是一种新形式的修正主义？指責我們提出的观点是教条主义的那种說法是正确的嗎？还是只不过是掩盖对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真正严重的倒退行为的外衣？

因此我們要問，我們所說的和平共处究竟指的是什么，因为它有变成各人隨心所欲地加以解釋的东西的危險。我們要問，认为在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可能实行和平共处的时候和地方实行和平共处的政策，其本身就意味着可靠的世界和平，这种想法是不是不正确？我們援引一两段苏联的言論來說明使我們担心的是什么。

“和平与和平共处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和平共处不單純是沒有战争，不是战争与战争之間的暫时的、不稳定的停战，这是两个对立的社会制度的共处，它建立在相互放棄用战争作为解决国际爭端的手段的基础上。”

——赫魯曉夫在苏共第二十二次
代表大会上的总结报告

“在当前条件下，已經开辟了一个前景：能够爭取到一个直到使当前分裂世界的社會和政治問題得到解决为止的整个时期的和平共处。”

——赫魯曉夫在苏共第二十二次
代表大会上的总结报告

“……苏共和其他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把它們的对外政策总路綫建立在和平共处的基础上，作为一九五七年各国共产党工人党宣言所宣布的口号的实际表現；爭取和平的行

动是各国共产党人的首要任务。”

——鮑·尼·波諾馬廖夫在一九六二年
《和平和社会主义問題》杂志座谈会
文章:《革命运动中的若干問題》

“和平共处不仅仅意味着沒有战争或某种暫时的、靠不住的休战。它首先是相互拒絕使用武装部队作为解决国与国間爭端的手段。”

——多列士在一九六二年《和平和社会主义問題》
杂志座谈会文章:《偉大革命变革的时代》

(把多列士的言論也列在里面是为了表明和平共处的概念是多么各种各样。)

上面这些引語都不是罕見的。还可以列举許多其他的話來說明，关于所說的那种和平共处，究竟我們是已經获得了呢，还是在获得的过程中；是意味着持久性质的和平呢，还是不是持久性质的和平等等，是不明确的。

我們要問，为什么这样不明确？一九六〇年莫斯科声明說得很清楚。我們引述如下：

“和平共处的路綫是动员群众开展积极行动反对和平敌人的路綫。

“各国間的和平共处，并不像修正主义者所断言的那样，意味着放棄阶级斗争。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共处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間的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在和平共处的条件下，出現着有助于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开展阶级斗争、殖民地和附屬国人民开展民族解放运动的可能性。同时，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解放斗争的成就又促进和平共处的巩固。”

問題的核心难道不是这个事实，即和平共处为帝国主义世界

中的群众作为爭取和平的一支力量而发生作用，为发展阶级斗争和为扩大民族解放运动，創造有利条件嗎？

列宁是否曾經从“相互”的意思考慮問題呢？我们认为，列宁的概念是，共产党人必須努力爭取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間的和平共处，同时反对导致战争的帝国主义侵略政策。但是他有沒有忽視这样一个事实：社会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之間的各种矛盾依然繼續存在，各帝国主义国家里的各壟斷集團之間的矛盾也依然繼續存在？在我們看来，列宁认为，不能忽視这些矛盾，同时共产党人必須积极利用这些矛盾来随时随地促进革命斗争。尽管社会主义世界发展壮大了，列宁看到的那些矛盾仍然存在着并且起着作用。至于我們引述的一九六〇年莫斯科声明所談关于和平共处的真正目的——难道不是往往被放在十分次要的地位嗎？难道不是存在着这种幻想，认为維护世界和平、爭取社会进步的斗争中的重要因素，是同帝国主义政府达成協議而不是在各地把群众組織起来采取行动嗎？我們认为这种幻想是存在的。

我們的意見是：和平共处的概念决不能在实际上变成压制殖民地和资本主义世界革命力量的政策，唯恐这种革命力量会扰乱同帝国主义关系上所希望的“平靜”时期。因为，这样一来，人們就开始走上投降的道路，并利用修正主义的論点来为他們改变了的态度辯解。

我們完全同意苏共中央一九六二年六月二十二日會議作出的決議中的如下論点：

“帝国主义阵营日益瘋狂地从事軍备竞赛、奉行欺騙人民的政策、侵略和国际挑衅的政策，用这些办法来反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政策。”

的确是这样。帝国主义政策的基础仍然是軍备的力量；核武

器仍然存在；在越南南方，某种程度上在老撾、朝鮮和其他地方，還存在着挑畔行動和戰爭。在我們談論沒有武器的世界、沒有戰爭的世界時，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不能不正視這些事實。事實是：這樣的世界將是一個帝國主義連同它目前那樣為非作歹的力量都不再存在的世界。

也許再引述一下一九六〇年莫斯科聲明會有助于人們正確地看待事物：——

“蘇聯將成為世界第一个工業強國。中國將成為強大的工業國家。社會主義體系的工業產品將占世界工業產品的一半以上。和平地區將更加擴大。資本主義各國的工人運動和殖民地、附屬國的民族解放運動將取得新的勝利。殖民主義體系將完全崩潰。社會主義和和平的力量將占絕對的優勢。

“在這些條件下，在社會主義在地球上還沒有取得完全勝利之前，在世界部分地區存在資本主義的情況下，將會出現把世界戰爭排除於社會生活之外的現實可能性。”

實際上，今天，包括蘇聯共產黨在內的某些共產黨的政策，難道不是建立在認為上述一切已經實現——雖然帝國主義肯定不承認這一點——这样一个概念的基礎上嗎？就和平共處的正確政策來說，我們認為，必須使我們的腳跟站在穩固的基礎上。

和平共處是社會主義國家同資本主義國家關係上的國家政策的基礎。我們也同意不可能有其他別的。但是讓我們把列寧的著作牢記在心。讓我們記住，社會主義體系生產的工業品還沒有占世界工業品的一半以上，殖民主義體系還沒有最後崩潰，而新殖民主義却在一天天滋長。

就我們的世界範圍的運動而論，就社會主義國家政府實際上奉行的政策而論，如果我們不記住這些，那麼建立在幻想基礎上的

一种政策就会导向冒險主义的行动和不可避免的退却。

这里，我們認為我們必須提一下近來使新西兰党深感不安的、同苏联政府政策有关的一些事情。前些时候我們听到許多关于“戴維营精神”的談論，虽然事实上在帝国主义领导人和社会主义领导人之間根本不能有什么精神上的一致。我們并不是說有时进行最高級談判也是不可取的，但是在当时，对那次談判的提法，可能在群众中造成这样的幻想，以为是“领导人”而不是人民能够得出結果和實現持久和平。这样的事情涣散了广大劳动人民的斗志，特别是在像新西兰这样的国家里；在新西兰，工党政客一直在鼓励劳动人民让领导去包办一切。

还有，不久以前，我們相信而且鼓励大家相信，苏联的政策意味着他們决不会第一个恢复核試驗。突然，像个晴天霹靂，他們宣布他們將重新开始一系列核試驗。当时我們了解其中的原因并表示同意，然而新西兰的一般工人却不能理解。由于苏联政府沒有預先說明被迫采取这种行动的原因，从而大大損害了和平运动。大多数工人終于說：苏联和美国——“讓你們两家去遭殃吧”。这是事实。

人們提出的論据之一是这个事实，即法国正在进行試驗。我們党支持这种論点，但是現在，在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簽訂之后，对于法国不久将用比前一个时期还要先进的武器在南太平洋进行試驗一事，又能指望我們說些什么呢？对新西兰人民來說，这种試驗的确是十分重要的。它就在我們的后院进行。然而，实际上，它所表明的最重要的事情是，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不仅在使我們免受繼續存在的核战争威胁方面，而且甚至在使我們免受大气层試驗的威胁方面，都是完全无效的。难道指望我們說，法帝国主义是新西兰和全世界人民的头号敌人，而避而不談原子毁灭的主要威

胁来自美帝国主义这一事实嗎？我們會走向何处呢？

在古巴，曾經否认建立了導彈基地，可是突然又出現這樣的情況，導彈基地已經建立了，並且是必要的。難道指望我們把這樣的事情巧辯過去嗎？在蘇聯對“帝國主義是紙老虎”這一概念加以責難之後，我們知道有人就在帝國主義戰術上最強大的地方把導彈基地建立起來。自然，为了避免戰爭不得不把導彈基地撤除，可是當時還把這種做法說成是和平的偉大勝利。

但是，我們不能不問一句：起初為什麼要把它們放到那裡去呢？——特別是因為現在我們聽說，蘇聯反正可以從自己的國境穩穩地擊中美國的要害。

順便說一句，我們也許可以說，關於今天帝國主義的處境，我們同意它是“垂死的和腐朽的資本主義”和“泥足巨人”。換句話說，從戰略的角度來看，它是虛弱的，雖然從戰術上來說，在某些問題上，例如古巴和導彈問題上，它可能是很強大的。因此，從戰術上來說，必須根據當前鬥爭的情況和條件來對付帝國主義。當退卻是不可避免時，為什麼硬要去攻打堅強的據點呢？

現在談談德國問題和柏林問題。蘇聯政府曾多少次約定了同東德簽訂和約的日期——可是每次都沒有下文。有時候看來簽訂條約是很重要的，有時候又好像是無關緊要的。這是很嚴重的，因為現在一般人（至少在我們國家的一般人）並不相信在一些重大問題上蘇聯政府今天是說話算數的。信任已經喪失了。在過去並不是這樣的，那時不管人們的政治見解如何，他們知道蘇聯說話算數，說到做到。在資本主義世界里，現在只有信念堅定的人還相信這一點，但是不可避免的趨向是：這種信念堅定的人將越來越少。

在世界形勢沒有發生任何根本性的變化而突然改變了政策，這種做法的最近一個例子是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

事實是，現在被說成是和平事業的如此重大的勝利和標誌着沒有武器或戰爭的世界的時代開始來臨的這項條約，它同美國和英國在前些時候所提出的建議几乎是一模一樣的，當時蘇聯曾正確地拒絕了那個建議，認為那是一個企圖掩蓋帝國主義者在戰爭中使用核武器這一實際陰謀的騙局。

我們發表了蘇聯早些時候拒絕英美建議的消息。現在我們該怎麼說呢？是參加大合唱，叫喊那是對和平的一大貢獻，從而同他們和我們在先前說過的話自相矛盾嗎？

這裡略引蘇聯領導過去就帝國主義關於部分禁止核試驗問題的建議所說過的一些話。尼·謝·赫魯曉夫一九六〇年一月十四日在最高蘇維埃第四次會議的報告中說：“我們想再次強調指出，蘇聯堅決主張：必須停止在空中、地上、地下和水下進行的一切形式的核武器試驗。如果仅仅通過一項只禁止在大氣層中進行試驗的決議，那麼，這將會打破各國人民對徹底停止試驗的希望。”

一九六一年九月十日，尼·謝·赫魯曉夫在接見《紐約時報》評論員蘇茲貝格時說：

“如果軍備競賽繼續進行，軍事工業繼續全力生產越來越多的核武器，停止試驗有什么用？

“我要說，這有點等於欺騙輿論，使人們放鬆警惕。人們將以為已經為阻止戰爭做了一些工作，而實際上什麼也沒有做，相反地，軍事機器將繼續全力開動。

“此外，肯尼迪和麥克米倫的建議一點沒有談到停止地下試驗爆炸和所謂的用于和平目的的爆炸……。

“因此，肯尼迪總統和麥克米倫首相提出的建議的目的不在于保證各國的安全，而在于追求宣傳目的來把責任推給別人，同時自己却悄悄地繼續實行儲存熱核武器和準備對社會

主义国家进行战争的老政策。我們不能同意这个。我們必須清醒地估計局勢，关心我們自己的安全。”

我們要問：局勢發生了什么變化呢？除非美帝国主义者現在可能認為他們儲存的不會因時間過久而變壞的核武器已經够多了！

這一切前進和後退，以及突然改變的過程是如何產生的呢？如果我們是馬克思主義者，我們必須尋找思想根源。而且，當我們在這樣做的時候只能得出這樣的結論：沒有遵循一種原則上穩定、策略上靈活的對待政策的堅定馬克思主義路線。事實上，事情已變得如此捉摸不定，以致我們黨不得不問問自己，它是否知道這一切將導致什麼後果。我們要問：這是否同修正主義滲入總的觀點和意識形態有很明顯的關係？我們認為是有關係的。這一切肯定要在世界工人運動的隊伍和一切進步人士中間造成不必要的混亂。

“核彈”有沒有改變了馬克思主義？

現在讓我們來研究一下最重要的方面，即今天我們世界運動的战略目標是什么這個問題。是反對帝國主義和爭取社會主義呢，還是反對核戰爭和爭取和平？

我們認為，前者是目標，而後者是主要的策略手段。如果看不清這一點，我們很快就會墮落到和平主義的立場上去；就永遠不會正視現代武器發展的真正含義；就會得出這樣的結論，認為核武器等等已經改變了馬克思主義的某些基本概念。這樣我們就會說，由於“核彈”的出現，戰爭已經不再是政治的另一種手段的繼續，戰爭的根源不再是產生帝國主義的社會制度。

換句話說，我們就會開始說，已經發生的變化，使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現代戰爭的性質及其根源的基本學說過時了。這種說法同認為戰爭是由於個別的一時的念頭或者一些事件所引起並沒有社會根源的唯心主義立場只有一步之差。照這樣推論下去，我們就會背離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而否認階級鬥爭的繼續存在及其重要性。

這裡，除了最近十年來蘇聯的外交政策突然反復改變之外，還出現了兩個重要的事態。一個是依靠群眾作為在爭取世界和平的鬥爭中最重要的因素，並且認識到爭取世界和平的鬥爭實質上是一場反帝鬥爭。另一個是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戰略目標是什么的問題。

我們再說一遍：我們的目標是反對帝國主義和爭取社會主義

呢，还是反对核战争和争取和平？我們已經說清楚，我们认为，前者是目标，后者是主要的策略手段。

苏共中央的代表們是怎样回答我們代表团的呢？他們說：

“你們知道，防止热核战争的問題占有一个重要的地位。世界共产党人所通过的宣言和声明說：‘各国共产党把爭取和平的斗争看作是自己的首要任务。’坦白地說，你們是不是这样想的呢？这同你們的讲话差得很远。你們贬低了爭取和平斗争的作用，但是八十一党声明說，战争与和平的問題是当代最迫切的問題；我們，首先是世界工人阶级，担负着防止世界核战争的重大責任。爭取和平的斗争不仅仅是一个策略問題，而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战略基础之一。八十一党声明說，共产党人认为自己的历史使命，不仅在于在世界范围内消灭剥削和貧困，以及从人类生活中永远消除世界战争的可能性，而且在于就在現时代使人类擺脫世界战争的慘禍。”

我們的态度是經典的馬克思主張态度。虽然我們毫不低估核战争的危險，但是我們认为这种态度仍然是正确的。我們不认为放棄或者逐漸取消我們的主要目标——社会主义，会对防止核战争或者其他任何战争有任何帮助。除非我們隱蔽到外层空間去，否則无法逃得那么远来使这种政策見效！

另一方面，苏共中央所提出的观点，难道不是使社会民主主义的修正主义有許多空子可钻嗎？在他們的影响下，我們运动的战略目标正在失去重要意义，而其他事情——事实上是当前行动的重要目标——却变得和主要目标一样重要了。

現在讓我們來檢查一下我們认为帝国主义者拥有核武器这一情况对革命斗争所产生的影响是什么。难道从长远来讲群众已經不再是强有力的因素了嗎？从下面引述的《真理报》一九六三年一

月七日的編輯部文章中的一段話可以看出我們要說明的問題：

“不能用老的尺度來對待現代戰爭。世界戰爭如果不能防止，立刻就會變成熱核戰爭，會造成千百萬人的死亡和破壞大量物質財富，會使整個整個的國家遭到毀滅。那些不考慮現代戰爭的後果，對核武器估計不足，或干脆不去考慮它，而把它當作對人們來說是次要的東西的人，是犯了大錯誤。”

我們知道，核武器具有可怕的破壞力，如果爆發核戰爭，那將是一場大悲劇。我們這些在新西蘭的人認為，必須把群眾組織起來防止核戰爭，我們歡迎社會主義國家的政府有助於防止核戰爭的任何行動。例如，一九六三年七月三十一日，中國政府呼籲世界各國政府舉行會議，來尋找途徑和辦法，不僅禁止一切核試驗，而且銷毀現在儲存的核武器、撤除一切基地和停止製造一切核武器，這是一個強有力的主張，可以把人們團結起來，展開鬥爭反對我國政府支持美帝國主義政策的政策，我國政府曾說過，不管美帝國主義的政策“對與不對”都予以支持。

我黨政治委員會一九六二年決議中所表达的我們的觀點是：爭取和平的鬥爭是一種廣泛的鬥爭，它包含著各種因素。我們已經指出過，這個鬥爭从根本上說是在殖民地世界，在受到新殖民主義威脅的地區，在革命形勢非常接近於社會主義革命的國家和在帝國主義世界本身，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我們認為，這場鬥爭是以群眾及其战斗組織為基礎的。在同帝國主義領導人舉行的最高級談判中取得成果，雖然是必要的，但是僅僅是暫時的，因為帝國主義仍然存在。爭取和平的鬥爭不能局限在反對核戰爭方面，但是我們認識到核戰爭的危險，我們要求徹底禁止一切核武器。這就是說，不僅禁止核試驗，而且要禁止製造核武器和禁止儲存核武器。這就是說，要銷毀現在儲存的核武器。

那么，这是不是說，我們應該像某些共产党現在所說的那样認為馬克思列寧主义关于战争与和平的理論已經过时而必須修正呢？难道因为核武器的发展，我們就得采取根本上是和平主义的立場么？难道我們現在能說这些武器已經改变了战争的性质，能說現在由于核威胁，任何正义的战争都不能进行，因而就沒有正义的战争这类事情了么？

我们认为答案是否定的。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話，那不是就将导致采取否定的态度而认为：在有核武器的情况下，正义的战争——社会主义国家保卫自己的战争、革命的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再也不能进行了么？那末帝国主义只要以“投核彈”相威胁，我們就会退却。

我們一旦抛棄了必須竭尽全力防止帝国主义的非正义战争的思想，开始认为必須不惜任何代价来防止一切战争，那末，我們很快就会嫉視任何反对帝国主义和爭取社会主义的武装斗争的开展，以及一切民族解放战争。认为列宁主义关于战争性质的概念已經过时的新理論，把这些事情从日程上一笔勾銷了。这正是那些抱有这种观点的人目前所力图做到的，虽然他們在实践中还不能完全把这一点付諸实施，而且将来也无法做到。

我們党正致力于迫使帝国主义者接受禁止核武器和禁止帝国主义手中的一切武器，但是我們沒有忽視，这必須經過革命斗争。我們記得，尽管帝国主义进行了“核訛詐”，而且就在帝国主义掌握的核彈的阴影下，通过武装斗争，在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越南北方、社会主义的朝鮮北方和社会主义的古巴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从另一方面來說，帝国主义在哪一个地方容許过和平地建立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呢？在任何地方都沒有一一除了第二次世界

大战后最初的几年在苏軍到达或者有压倒的影响的一些地方以外。

我們已經說过，今天在东南亚、南美、南非和許多殖民地和前殖民地的地方，存在使社会主义取得进一步进展的可能性——只要我們的运动不在帝国主义核訛詐的威胁面前屈服。

但是，一旦让帝国主义看出，如果他們用核彈来进行威胁，我們的运动就会从我們的革命斗争中退却，那末他們就会大規模地进行这种威胁。他們必然会采取这种策略，因此，可以看到，这种恐惧，归根結蒂会把我們的运动引向什么地方去。

明明白白的事实是：帝国主义国家由于它們的本性，是不会对别人发善心的，也不会谅解别人的恐惧的。事实上它們利用这种恐惧。他們也不会听取关于人类福利的議論。在我們所生活的这个时代里，在帝国主义沒落的时期里，在我我們看来，最大的危險是在帝国主义者面前全面退却。

我們也觉得奇怪的是：在关于帝国主义拥有核彈这一情况的种种新的談論中，社会主义世界也掌握了核彈这一事实似乎却被忽視了。幸而帝国主义倒沒有忽視这一点。阻止帝国主义“扔核彈”的这种威懾力量，是世界和平的一个强有力的因素，是保证帝国主义在革命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中不敢搞核訛詐的强有力的因素。

我們认为，把核武器問題而不是把阶级斗争作为主要动力是錯誤的。阶级斗争才是决定性的因素。不管核战争的前景多么可怕，阶级斗争并没有被消灭。我們运动的斗争决不能局限于促使帝国主义奉行和平政策、不使用核武器，因为要有可靠的和平，就必須消灭帝国主义。請看，即使在要迫使帝国主义实行和平政策的时候，有些党在实际上也已經撇开了在这方面的决定性因素——

群众的作用。

讓我們再說一遍：我們運動的戰略目標是消灭壟斷資本，由工人階級取得國家政權，并以此為起點建設社會主義；而我們時代的主要策略集中點則是防止帝國主義戰爭，特別是防止核戰爭。

本世紀最大的謊言

因此，我們要談談人們正確地称之为“本世紀的謊言”的言論，那就是不斷地指責中國共產黨領導主張通過核戰爭在人類的廢墟上建設社會主義。

關於這個問題，我們的代表團在莫斯科曾堅定地說，不仅是資產階級的宣傳，而且还有一些共產黨領導人、特別是蘇聯領導人在散布這種想法，從而造成了這樣一種局面，使有些工人得出社會主義的中國希望戰爭這樣的結論。許多人一向認為沒有任何社會主義國家希望戰爭，而現在他們不僅聽到帝國主義者說，而且還聽到一些社會主義國家的領導人說，有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是希望戰爭的，從而播下了不團結和失望的種子。

並不是所有的人都願意或者能夠讀一讀中國人自己究竟對這個問題是怎麼講的。據我們了解，中國黨的領導在他們的綱領或政策中從未這樣講過。事實上，他們一向主張以對全世界群眾的信心為基礎的積極的和平政策。他們親自肯定地對新西蘭共產黨領導說，他們不主張通過核戰爭實現共產主義。他們所說的只是，如果帝國主義者發動這樣一次戰爭，並不是一切都完了，人類遭受嚴重的損失後，將會生存下來，社會主義終將勝利。事實上，一九六〇年八十一黨聲明講的和這一樣！

但是，蘇聯中央委員會的代表們一九六三年九月四日在莫斯科回答上述的話時，再一次地說：

“中國同志頑固地宣傳這樣一種思想：通過一次熱核戰

爭，在帝国主义毁灭的廢墟上，世界人民将会創造更好一千倍的文明和建設一个真正美好的生活。他們所說的是：消灭帝国主义，而用不着管整个民族和国家的毁灭；归根結蒂战争是有利於社会主义的——而且中国同志正企图把我們的整个运动导向这个結論！他們怀着这样的目的宣傳战争并不是那么可怕。一九五七年，中国共产党的主席在莫斯科提出过这样的論点：如果人类毁灭一半，那也沒有什么可怕，这将埋葬帝国主义。但是你們不想一想，所有的新西兰人民可能在这一半人类里嗎？那末由誰來在你們的土地上創造美好的未來呢？問問你們的工人們，他們是否同意。”

中国人沒有讲过这样的话。我們知道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在莫斯科实际上是怎样讲的。我們党的政治委員会委員阿·奧斯特勒当时作为新西兰共产党的代表出席了那次世界共产党會議。

为什么总是歪曲地引述別人的話呢？肯定是一个人理亏的时候才歪曲地引述旁人的話。这不是任何自称是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人应当耽迷的一种习惯。

这給我們的世界运动造成极大的損害。

和平和民族解放斗争

我們堅持這一主張，即：對於世界範圍的民族解放斗争的各个方面，對於它在反對帝國主義、爭取和平的斗争中以及在為使社會主義取得進一步發展鋪平道路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必須給予充分的考慮。

對於我們這些在新西蘭的人來說，這是一個極關重要的問題。民族解放運動的勝利，帝國主義通過新殖民主義的門徑卷土重來的企圖的失敗和東南亞從民族解放發展到社會主義的過程，為新西蘭的進步打開了大門。這使我們有可能擺脫帝國主義壟斷資本的枷鎖，特別是擺脫美國政策的章魚般的控制，正是美國的政策使我們處於東南亞條約組織的最前線，並且帶來了時時刻刻都存在的被卷入戰爭的危險。

我們已經指出，就爭取世界和平的斗争而言，我們認為對於反對帝國主義的民族解放運動所起的極關重要的作用沒有給以足夠的注意。還有某些其他方面，特別是關係到最近蘇共政策的一些方面，使我們深感不安。對於帝國主義對東南亞和南美的傀儡政府的政策所取得的成功，對於帝國主義的勢力在印度等國家裏重新發展，或者對於過去一年中在伊拉克發生的更可悲的事件，沒有一個人能感到高興。

在我們看來，下述引語似乎概括了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一般態度，這些引語雖然很長，但卻說明問題：

“民族解放革命不是由於外界影響或壓力引起的。它們

是一个国家的发展的直接結果。但是任何这种革命要取得成功，有利的国际局势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應該結合新的和更为有利的国际局势来看过去十年中这一运动所取得的巨大进展。社会主义世界体系——它在这时已經形成——正在发展成为决定世界历史发展的方向和步伐的主要因素。

“今天，社会主义大家庭日益增长的力量和它的成員給予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支持，是民族解放革命获得成功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国际因素。

“这絲毫也不会贬低殖民地、前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群众斗争的重要性。因为，如果人民沒有表現出勇气和坚忍不拔的精神，沒有清楚地了解他們的最終目的，任何革命都是无法取得胜利的。

“但是还存在着这样一个不可避免的事实：大多数新发展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人口都較少，并且缺乏进行现代战争的手段和經驗。

“相反，它們的帝国主义敌手們却既有武器又有經驗。特別是它們有导弹，而这些正在发展中的国家却沒有可以与之匹敌的武器。

“虽然勇气和坚忍不拔的精神具有头等重要意义，但是它們并不足以抵御帝国主义的进攻，保卫一个年輕的国家的独立。因此，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首先是苏联的支持，是保障独立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

“苏联是唯一拥有制止任何侵略者的軍事能力的社会主义国家。每当帝国主义对这一或另一年轻国家进行侵略的时候，苏联的行动总能对它們起到使其神志清醒的影响——帝

国主义者深知，苏联将毫不犹豫地使用它的軍事力量来制止侵略（然后举出了关于埃及、叙利亚和伊拉克的例子）。

“苏联的軍事力量是如此显赫，以致有时只需要苏联政府发表一紙声明，便能促使西方国家不敢采取軍事行动。例如，当苏联政府說，它将支持印度把果阿、第烏和达曼从葡萄牙法西斯主义者手中解放出来的时候，西方关于要对印度进行制裁，包括进行軍事制裁的一切談論都馬上消声匿迹了（作者說在西伊里安問題上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

“軍事力量来自經濟力量。这着重說明了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綱領对所有正在同殖民主义斗争的国家的价值。这是一个在苏联建立共产主义的物质和技术基础的綱領。这个綱領实现以后就会使苏联在經濟上具有超过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优势。

“这样一来，苏联便将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而这归根結蒂将使帝国主义沒有能力为推翻亚洲、非洲、拉丁美洲革命政府而发动侵略。

“因此，成功地执行苏联的共产主义建設綱領，是符合一切爭取彻底摆脱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压迫的国家的利益的，也是符合这种解放运动的一切忠誠的战士的利益的。”

——引自一九六三年第二十六期《新时代》杂志所載尤里·鮑奇卡廖夫的文章：《苏联和民族解放运动》

实际上，这篇文章无非是說，发动反对帝国主义者的革命是徒劳无益的，因为它们有武器又有經驗。至于如上面所引述的关于爭取群众的“心灵”，使他們想望社会主义的問題，这里又是苏联，又是它所取得的越来越大的成就和日益增长的威力是民族解放运动发展中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而不是人民的积极性，不是在斗

爭中的群众。

我们认为这是修正主义。它极容易不自觉地导致大国沙文主义，这种大国沙文主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虽然采取了新的形式，但是其内容却仍然是可以感觉到的。

列宁是怎样看这个問題的呢？我們从他所著的《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关于俄共（布）的策略的报告提綱》一文中，引述如下的几段話：

“占全世界人口絕大多数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劳动群众，从二十世紀初叶起，特别是在俄国、土耳其、波斯及中国爆发革命后，已觉醒过来，开始参加政治生活。

“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的帝国主义战争和俄国苏維埃政权，使这些群众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使他們成了世界政治和用革命行动摧毁帝国主义事业中的积极因素，但欧美那批有教养的市儈庸人，包括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领袖在内，却頑固地无视这一点。”

我們知道，由于苏联共产党的领导和苏联人民在建設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所作出的英勇努力，苏联取得了巨大的进展。我們知道帝国主义者发展了新武器。但是，我們不相信有任何事情能使得人民的斗争退居次要地位。但是事实上，在对待民族解放斗争的态度方面，他們所說的和所做的却正是这样一些东西。

我們对像老撾和越南这样一些斗争激烈的地区的局势也感到不满意。在南越，存在着把斗争推进到使社会主义取得新的胜利——扩大社会主义世界——的可能性。把和平共处的政策运用到这种局势中来，是否意味着由于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間作出的一些官方的安排，社会主义在目前就必须局限在它現存的疆界之内呢？在研究了老撾等国家內的事态和人們对这些国家的

政策之后，我們認為实际上事情正變得非常接近于这种情况。

难道某些共产党不是往往把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混为一談，好像擺脫帝国主义的控制就会消灭資本主义的一切弊端，好像資本主义发展的基本規律在新解放地区不起作用，而我們所熟悉的資本主义世界的階級斗争現在就不存在了嗎？

我們認為，这种情况是存在的，其結果是为新殖民主義敞开大門。人們現在对于这个問題，并沒有以列寧在《民族和殖民地問題提綱初稿》中提出的态度来处理。列寧說：

“11. 在封建关系或宗法关系和宗法农民关系占优势的比較落后的国家和民族中，要特別注意以下各点。

.....

“第五、必須坚决反对把落后国家內的資产阶级民主解放思潮塗上共产主义的色彩；共产国际只是在这个条件下，即当一切落后国家中未来的无产阶级政党（不仅名义上是共产党）的分子組織起来，并且认识到同本国資产阶级民主运动作斗争这些特別任务的时候，才应当援助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資产阶级民主性的民族运动；共产国际应当同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資产阶级民主派結成临时联盟，但是不要同他們混为一体，甚至当无产阶级运动还处在萌芽状态时，也絕對要保持这一运动的独立性；

“第六、必須向一切国家、特别是落后国家的最广大的劳动群众不断地說明和揭露帝国主义列强一貫实行的欺騙政策，帝国主义列强打着建立政治上独立的国家的幌子，来建立在經濟、財政和軍事方面都完全依賴于它們的国家；在目前国际形势下，除建立各苏維埃共和国聯盟以外，附屬国和弱小民族別无生路。”

是否曾經鼓勵印度黨去貫徹執行列寧的路線呢？他們最近圍繞“保卫祖國”這個口號所提出的概念使我們不能抱有這種看法。

讓我們暫時先不考慮馬克思主義的基本概念，我們注意到，有人經常說必須在解放了的後面國家里建立工業，以便有足夠強大的無產階級基礎來把鬥爭推進到社會主義的鬥爭。無論我們從哪一方面來看，在我們看來他們似乎是在提出某種理由來說明為什麼在目前不能考慮在新的地區爭取社會主義的新勝利。難道馬克思主義在過去曾經提出過否定非工業國家可向社會主義前進的理論嗎？這種進展現在主要正是在這些地區發生的。最近的一個例子，大概也是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越南北方。

今天，帝國主義正在提供“援助”方面同蘇聯和其他國家進行競爭，就解放了的地區而言，它還是做得相當成功的。例如在印度，美援正在迅速增加。我們知道，社會主義國家的援助是真正的援助，帝國主義的援助只不過是為了掩飾將來的剝削的一種外衣，促使在印度和諸如安哥拉、莫三比克等一些非洲國家內的新殖民地化得到發展，並且越來越猖狂地試圖在其他地方，如在印度尼西亞這樣重要的國家里進行這種滲透。但是，要解決這種問題並不能依靠許多修正主義的新理論，而是要依靠列寧在下面的引語中所提出的辦法：

“如果我們不背叛社會主義，那就應當支持反對我們主要敵人即大資本階級的任何起義，只要這不是反動階級的起義。如果我們拒絕支持被兼并地區的起義，那在客觀上我們就是兼并者。正是在‘帝國主義時代’，在這個開始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時代，無產階級今天才要竭力支持被兼并地區的起義，以便明天或者同時進攻被這種起義削弱的‘大’資本階級。”

——列寧：《關於自決問題的爭論總結》

只有通过这种做法，在新西兰这样的国家里才会出現前进的可能性，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才会比較迅速地消除。

我們的代表团是否得到了任何有力的答复，可以使我們在这些問題上的怀疑消除，使我們相信他們目前政策的基础是一种正确的馬克思主張的态度呢？答复是：沒有。苏共中央委員會的代表們對我們的代表团是這樣說的：

“首先，你們把民族解放运动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和工人运动对立起来。你們說民族解放运动在爭取和平的斗争中起着最重大的作用。但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尽管民族解放运动具有巨大的革命重要性，但是它不能在世界革命进程和防止新的世界战争的斗争中起决定性的作用。

“你們指責我們在爭取和平的斗争中沒有足够重視民族解放运动，对于这个指責，我們已經一再駁斥过从中国共产党口中听到的这个指責了。

“我們的党綱对于这一点讲得很清楚。

“我們的綱領說，新解放国家人民的力量和社会主义体系人民的力量在反对战争威胁的斗争中的團結，是爭取世界和平的最大因素。这个反映亿万人类的意志和力量的和平陣綫能够迫使帝国主义退却……以及世界解放运动。

“你們談到某些中心，东南亚和南美。你們痛心地注意到帝国主义在印度的发展。我們有同感。

“沙文主义和反动势力的增长是同中国和印度的边界問題直接有关的。高士同志在一九六〇年的會議上說过，‘……它助长了这个国家里的反共宣传，这种歇斯底里是被用来反对这个国家的——这里讲的这个国家就是印度。’

“我們要坦率地告訴你們，中国领导在印一中冲突中的

政策，表明它从和平共处原则——包括万隆会议所确定的原则——后退了。它对印度共产党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使之不得不面临极端困难的处境。而你们却硬说苏联共产党的路线危害了斗争中的人民。

“不是别人，而正是苏联给予了民族解放和反帝斗争以全面的支持。阿尔及利亚人民在斗争中所使用的是苏联武器。许多新解放的国家是用苏联的援助和武器来保卫自己对付帝国主义的。一旦需要，苏联就毫不犹豫地把全部力量投入斗争，古巴就是最生动的例子之一。”

在东南亚向社会主义前进的可能性就这样被忽视了，而且也没有客观地研究一下像印度这样的政府到底在多长时间内仍是为民族解放而斗争的政府。苏联领导人断言，印度是对的，而人民中国，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却是侵略者。但是，亚洲或东南亚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这样说过，而其中大部分国家还是非共产主义国家。事实上，他们所说的正好相反，他们说他们没有看到中国有任何侵略的迹象。

请原谅，我们想问一下，尽管他们说了那些漂亮话，就他们对印度的政策而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究竟表现在哪里呢？顺便提一下，苏共的代表们在同我们的代表团的会谈中，没有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提到过新殖民主义日益增长的威胁。所有的修正主义者都发现，这种事态发展很难同他们的公开的政策性言论相吻合。因为提到这种威胁会使人们再次同帝国主义正面对抗。

所有这一切导向何处？不仅导致我们的运动出现世界性分裂的危险，而且导致这样一种局面：今天再也没有人能谈论磐石般的社会主义世界并且以此作为制定政策的基础了。我们发现，有人对印度提供了大量援助，而印度本来就从美帝国主义那里得到了

足够的援助(附帶說一句，我們的代表团在參加莫斯科双边會談后回国途中曾在德里着陆，在那里的机場上我們看到一架美国空軍的飞机就停在苏联提供的一架运兵和轰炸用的飞机旁边)，但是却拒絕向社会主义的中国提供任何援助。这些人談論什么維护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但是他們却拒绝对阿尔巴尼亚提供援助。

是的，我們必須解决这个問題。而唯一的办法是坚定不移地以正确的馬克思列宁主义为根据。

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問題

爭取比較发达的資本主義國家中的群众擺脫社會民主主义思想的束縛的問題，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主要問題——是我們在新西兰的这些人特別关心的問題。在这个問題上，我們是采取根据长期經驗得出的看法——我們終生都卷入了這場斗争，尽管肯定地說，到今天为止，无论在哪里，还没有任何共产党在这場斗争中取得完全的胜利。

在今天的世界上，在已經存在一个很大的社会主义地区的情况下，修正主义再次提出这种主張：在对待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時候，意识形态問題是无关重要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包含广泛的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而且由于社会民主党有工人阶级的群众基础，它不是资产阶级政党。

（这也是今天如此公开地表現出来的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新愛情的基础。）

列寧曾經称新西兰为“第二国际的天堂”。社会民主主义的政策第一次以立法的形式在我国出現是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在当时的几届自由党—工党政府执行的政策中出現。所以，就这个問題而論，我們有过一段漫长的历史。

我们认为，我們当前所关心的是，基本上是修正主义的理論已經把馬克思和列寧所闡述的关于如何对待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基本經典理論当作过时的或者在新条件下不适用的东西而摒棄了。这就在我們的世界运动內在对待社会民主主义及其

理論和實踐這個重大問題上形成了這樣一種普遍的感覺，使人們忽視思想問題的重要性，並且開始把社會民主主義說成是一種真正的社會主義思潮，或者是不需要在思想上作任何根本改變就可以被爭取過來，成為爭取社會主義的鬥爭中的一支有用的同盟軍。

這不僅是危險的，使人們忽視我們共產黨作為工人階級政黨的領導作用，而且不可避免地為社會民主主义思想滲入我們自己的隊伍打開方便之門。那樣我們就會成為左翼工黨的“鞭策派”，而不能看到左翼社會民主主義仍然是資產階級思想的一種形式，它有時像右翼社會民主黨一樣對階級敵人有用。有時，它在出賣工人利益方面甚至比右翼社會民主黨更有用，因為它用比較有戰鬥性的言詞來掩蓋它的反動行徑。

列寧在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上所講的關於社會民主黨的性質的話，今天仍然是正確的。我們扼要地援引如下：

“事實上，‘工會運動的政治組織’或‘政治表現’這兩個概念是錯誤的。

“當然，工黨大部分是由工人組成的。但是，一個黨是不是真正的工人政黨，不僅要看它是不是由工人組成的，而且要看是誰領導它以及它的行動和政治策略的內容如何。只有根據後者，才能確定這個黨是不是真正的無產階級政黨。

“從這個唯一正確的標準來看，工黨完全是資產階級的政黨。雖然它是由工人組成的，但是領導它的是反革命分子，是……最壞的反革命分子。”

——列寧在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上
關於加入英國工黨問題的發言

但是，今天不是有許多人有忽視社會民主黨在意識形態上是資產階級政黨這個主要因素的危險嗎？在我們看來，甚至連蘇共

綱領也沒有提到這一點。蘇共綱領說：

“歷史經驗表明了社會民主主義既在意識形态上也在政治上的破產。即使在改良主義政黨執政的時候，它們也只限於進行一些局部的、不觸及壟斷資產階級統治的改革。反共主義把社會改良主義引入了思想政治的絕境。這是社會民主主義發生危機的主要原因之一。”

——摘自蘇共綱領

並不是反共主義把社會改良主義引入了思想上和政治上的絕境。反共主義只是一種建立在資本主義基礎上的思想觀點的必然結果。

我們認為，這會造成把在這個問題上的戰術與目標混淆起來的危險。我們的戰術是盡一切可能同受社會民主黨影響的群眾聯合行動，而我們的目標則是從勞動人民的腦海中清除社會民主主義思想，使他們樹立真正的工人階級觀點，了解我們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觀點的正確性，隨之而來的必然是群眾自動地支持我們共產黨。我們認為，如果我們不這樣做，那就是敞開大門讓修正主義進來，並取消作為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的共產黨。

我們認為，在新西蘭按照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聲明的路線，並結合我國情況圍繞著爭取和平和反對壟斷資本展開更為有效的鬥爭的時候，我們所碰到的第一個障礙就是社會民主主義思想對工人思想的影響。對我們來說，建立工人階級的統一戰線是起點。而在這方面，這種思想立即就起了阻礙作用。它使人們接受現狀，認為進行鬥爭是沒有希望的，人們只需依賴工黨領袖就可以了，而工黨領袖的政策清楚地表明，他們本身就是壟斷資本的工具。這種思想造成了一種觀念，即“領袖們會安排的”，群眾是無足輕重的，他們的全部作用只是每隔三年乖乖地投一次票而已。

这就是我們在新西兰所面临的情况。

在我們看来，社会民主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是维护帝国主义、即垄断资本主义的反动統治的一根重要支柱。列宁早就指出过，社会民主党是资产阶级政党的变种。

在工人阶级运动的日常斗争中以及在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必須以一切可能的方式同社会民主党人以及受他們影响的工人群众一道，采取广泛的联合行动。但是，与此同时，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必須同社会民主党严格而清楚地划清思想界綫，并且努力把正直的工人阶级分子爭取过来，使这些人能够摆脱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想影响，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且开展坚持不懈的阶级斗争来反对资本主义和爭取社会主义的胜利。

在新西兰，作为资产阶级思想的变种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本身正在很大程度上丧失其在工人队伍中的影响。我們并不想制造一种幻想，以为在群众当中正在形成一种牢固地建立在斗争的基础上的工人阶级思想观点。情况并非如此，但是，相信新西兰工党下次当选后将会解决工人的問題这种看法却正在迅速消失。社会民主主义对工人所以能有影响，往往是依靠大多数产业工人认为工党比其他资产阶级政党要好一点这样一种不牢靠的情况。

我们认为，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在帝国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没落的时代，这种发展是合乎邏輯的。但是，我們担心，这一方面的情况并没有在全世界范围内明确地被指出来。相反，认为社会民主主义的性质正在改变的幻想似乎正在日益滋长。

列宁是怎样闡明社会民主主义在工人队伍中产生的呢？他认为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呢？列宁大体上是这样說的：从世界的角度来看，由于帝国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有可能在不严重影响当时不断增长的利润和帝国主义扩张的情况下，在各主要工业国家里造

成一个“工人貴族”。列寧說事实上，由此所造成的工业化国家內階級斗争的削弱，使他們在那个阶段的所有盈亏賬上得到了盈余。

我們知道，這并不是像某些資本主义的辯護士企图使我們相信的那样，是什么資本主义在使人民群众得到較高的生活水平。不是的，那个时期是他們迅速扩展的殖民帝国进行最残酷、最严重的剥削的时期。但是，在現在这些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占有陣地的国家里，当时是有可能通过向劳工运动领导人吹捧夸贊，給他們荣誉，給他們拿干薪的差事，对最有能力的一部分工人，则在牺牲殖民地各国人民的利益的情况下讓他們有較高的生活水平等等，来收买劳工运动的。統治阶级的这种手法，在我們現在称之为“西方”的整个地区以及当时的英帝国的某些部分，如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是普遍采用的。

列寧在《打着別人的旗帜》一文中这样写道：

“拿占領殖民地和扩大殖民版圖來說吧。这无疑是上述时代和多数大国的特点之一。

“这在經濟上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資产阶级得到相当数量的超額利潤和特权，其次无疑是意味着极少数小資产者以及高級职员和工人运动中的官吏等等能够得到这些‘大块蛋糕’的一点碎屑。”

“工人阶级当中的极少数人在殖民地和特权的利益当中‘享用’一点油水，这样的事情在英國就有过，这是无可爭辯的事实，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承认过和指出过。

“但是在当时，只有英國才有这种現象，而随着欧洲所有的资本主义大国先后占領大量的殖民地，隨着資本主义的帝国主义时期的发展和成长，这就成了所有这些大国的普遍現象。”

我們談這個問題是因為在我們看來，下面這種看法是正確的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如果說產生社會民主主義的基本原因是如同列寧所論述的那樣，那必然就意味着，現在，由於帝國主義在沒落，它從事剝削活動的範圍在縮小，可以進入的新地區很少，而且由於帝國主義的世界危機也因而日益加劇，所以社會民主主義思想在工人隊伍中的物質基礎也正在消失。

我們必須充分掌握住社會民主主義是一種正在衰亡的思想這一觀念，並且认清它的種種含義。這樣，我們各黨在這些國家里的領導作用將明顯地表現出來，並將有可能在堅持原則的條件下運用靈活的策略。如果我們不明確這一點，那就会作出不必要的讓步，就會產生幻想，認為必要的統一戰線工作本身就是目的，就會認為拋棄社會主義目標的一切偽裝的工黨領袖，不再是老板的工具，不管是有意識的還是無意識的工具。

我們認為，今天在我們的世界運動中正是沒有明確這一點。我們希望能夠作出更加深刻的分析。

不幸，我們去莫斯科的代表團所表达的上述這些看法沒有得到任何贊同，雖然在會談結束時大家同意有必要更深刻地分析有關當前社會民主主義的情況，並且表示歡迎我們參加作這種分析。

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态度

无疑，这个国家里許多积极关心工人阶级政治活动的人过去一直认为，南斯拉夫在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领导下所发生的情况，对新西兰來說，是一个有点学院味道的問題。

我們自己曾經一度陷入这个陷阱。但是，事实上，結果证明它不但對我們的整个世界运动，而且特別是对我們新西兰具有迫切的重要意义。因为在南斯拉夫，我們从理論和实践中看到了一个背离社会主义的成就而开倒車的例子。之所以出現这种开倒車的現象，是因为他們把人們从列寧的許多著作中可以讀到的修正馬克思主义的早期修正主义者的理論付諸实行了。

因此，我們认为，批判地审查而不是欢迎回到我們的队伍来，才是我們对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应当采取的态度。

我們认为，自从一九六〇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會議以来，铁托领导下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情况絲毫沒有改变，而一九六〇年的會議极其严厉地譴責了它。他們可能进行了一些改良来消除南斯拉夫国内的某些弊病，但是，这些改良是在修正主义总的范围内进行的。如上所述，我們认为这个問題同我們剛剛談过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整个問題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这是个重要問題。

我們认为，尼·謝·赫魯曉夫一九六三年初在德国統一社会党代表大会上第一次代表苏共表示的目前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态度，是違反一九六〇年声明的。

在那次代表大会上，在保持南斯拉夫現存的“社会主义”和鼓励其发展的借口下，朝着欢迎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作为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归队的方向走了第一步。如果要作任何修改的話，都需要經過世界性的集体討論这一点則被忽視了。

我們將引用我們党签了字的一九六〇年八十一党声明中的一段話。这个声明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問題是这样說的：

“各国共产党一致譴責国际机会主义的南斯拉夫变种——現代修正主义者的‘理論’的集中表現。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领导人背叛了馬克思列宁主义，宣布馬克思列宁主义已經过时，用自己的反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綱領同一九五七年宣言相对抗，把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立起来，使自己的国家脱离了社会主义阵营，使它依賴美国帝国主义者和其他帝国主义者的所謂‘援助’，从而使南斯拉夫人民的英勇斗争所取得的革命成果有失去的危險。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进行着反对社会主义阵营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破坏工作。他們以非集团政策为借口，进行着有害于一切爱好和平力量和国家的團結的活动。进一步揭露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领导人，为了使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不受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反列宁主义思想的影响而积极斗争，仍然是各国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一项必要任务。”

我們并不认为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有什么改变。但是我們认为另外有些人却是改变了。他們不再支持八十一党声明。我們要問，如果不經過集体研究就可以加以改变的話，那么作出决定又有什麼用呢？

同时，我們要強調指出，我們絕對不应当在南斯拉夫这个国家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关系的問題上发生思想混乱。这种关

系的存在是正确的。但是我們說的是共产党人之間的关系，我們觉得，看到苏联同南斯拉夫的友好关系日益发展而同社会主义的阿尔巴尼亚却断絕了关系，这是令人非常不安的。

尼·謝·赫魯曉夫在一九五八年七月举行的德国統一社会党的一次代表大会上說：“南斯拉夫領導人在他們的言論中和正式文件中赤裸裸地提出了違反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实质的修正主义观点。”他还說：“南斯拉夫領導集团的綱領实际上不过是右翼社会民主党人許許多修正主义綱領的并不高明的翻版。因此，南斯拉夫領導人不是走革命的馬克思列宁主义學說的道路，而是走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伯恩施坦、考茨基和其他叛徒所开辟的道路。”

我們同意尼·謝·赫魯曉夫当时的态度。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理論根本上是沿着通往社会民主主义的道路倒退，难道不正是这一事实才使它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重要問題嗎？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仍然坚持他們在国际事务中的第三种力量的概念，那就是說他們繼續置身于社会主义阵营之外。正如尼·謝·赫魯曉夫过去曾經清楚說明的，这是背叛，那么，为什么現在却不是背叛了呢？

南斯拉夫领导人认为，为了建設社会主义，党和国家的領導作用应当縮小到次要地位，必須避免企业由国家集中管理，不应当实行农业集体化，他們的这种观点改变了嗎？沒有改变。今天，他們可能試圖糾正分散化所引起的某些重大弊病，但是他們只是作些拙劣的修补工作而已。我們重复一遍，他們的修正主义理論仍然沒有变，其結果也仍然沒有变——在工业上，存在着一种新的自由企业家，他們事实上是按照同资本主义公司的經理一样的原則办事的；在农村，小块私有土地正落入数目越来越少的一些人的手中。

我們認為，南斯拉夫新宪法只是證明了一九六〇年聲明關於南斯拉夫修正主義問題的結論是正確的。我們不能認為米·安·蘇斯洛夫對我們的代表團所說的下述這番話是有力的答覆：

“關於我們同南斯拉夫的關係。我們的印象是，在這個問題上，你們的了解是錯誤的——關於你（維·喬·威爾科克斯）在北京所談的關於資本主義復辟的講話。我們希望，更好地了解事實會使你們回到較正確的立場上來。南斯拉夫領導人過去曾經犯了重大錯誤，我們曾經十分正當地本着有原則的方式批評了他們。但是，我們必須正視這個事實：它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他們有一個共產黨，我們的國際義務是，不僅僅無休止地重複你們就南斯拉夫共產黨及其領導人的所講的話，而是應當盡我們的最大力量，幫助他們克服他們的錯誤，恢復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的作用。不能說，我們所採取的這種行動是違反和平、民主和社會主義的。”

然而，當這種行動給予南斯拉夫和全世界的修正主義以更大鼓勵的時候，人們就可以說這些行動是違反和平、民主和社會主義的了。我們過去就曾經說過這種行動會產生怎樣的結果。我們現在仍然持這樣的看法！

另一方面，人們可以問問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為什麼對社會主義的阿爾巴尼亞不採取這種態度呢？他們在給新西蘭共產黨和其他共產黨的信中說過，他們認為阿爾巴尼亞是社會主義國家，儘管它的領導犯了“錯誤”。那麼，為什麼以不同的態度對待呢？

蘇聯領導人在一九六〇年同意修正主義是我們的世界運動中的主要危險，他們當時對把南斯拉夫領導人劃為修正主義者並沒有疑慮。人們只能認為，他們在上述講話中所提到的錯誤是指修正

主义的錯誤。为什么可以同修正主义者紧紧握手以帮助他們，而拒絕同那些被认为是教条主义者的人紧紧握手或帮助他們呢？說什么阿尔巴尼亚领导人“罵人和誹謗人”太甚了，这并沒有回答問題。以铁托为首的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有着謾罵和誹謗苏共領導的突出的紀錄，他們絲毫沒有道過歉，也沒有承认过錯誤。

这不仅是我們在这本小册子里多次提到的在原則和實踐問題上的混乱的又一个例证，而且是同修正主义日益亲近的例证。难道不是这样嗎？

我們的話就說到这里吧。

結束語——在新西兰的任务

上面我們試圖簡要說明我們对今天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存在着分歧的一些重要的理論方面的观点。我們沒有特別挑出苏共領導來談，因为其他許多人也持有类似的观点。我們之所以不能不談談苏共領導的观点，是因为他們的观点具有普遍的广泛影响。

可是，我們不能接受去年八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双边会談中苏斯洛夫向我們代表团表明的苏共中央委員會的这一看法，当时，苏斯洛夫代表苏共中央說：

“最后，我們請你們注意下述情况。一向对兄弟的新西兰共产党抱有兄弟般的同情态度的苏共中央，对新西兰共产党領導目前的立場感到不安。我們认为，你們党由于背棄宣言和声明的馬克思列宁主义原則，由于疏远了共产党兄弟大家庭，正在走上很可能給你們党造成严重損害的錯誤道路。

“我們认为，坦率地向你們指出，你們現在所持的态度可能給你們党、給新西兰工人阶级和一切劳动人民带来多么大的損害，是我們的国际主义义务。

“我們认为，我們两党——苏共 and 新共——之間的分歧还没有达到无法弥补的地步。而且，也沒有客观原因妨碍苏共 and 新共恢复兄弟关系。如果新共領導表現出对当前事态有所

了解的話，如果它設法爭取到足够的力量來維护世界上絕大
多數共产党現在所奉行的唯一正确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路綫的
話，它就会胜任它在当代复杂形势中所面临的重大任务。要
这样做，現在为时还不算太晚。

“就我們來說，我們党将尽一切力量來保持一向标志着我
們两党之間的关系的兄弟情誼和誠意，这种关系首先符合新
西兰共产党的利益、苏联共产党的利益、你們国家一切劳动人
民的利益、苏維埃社会主义联盟各国人民的利益，而且也符合
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

坦白地說，这番話很像是說：“要同意我們的观点，否則你們就
不再是兄弟的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一部分了。”但是，任何一个党
都沒有权力作出这样的决定。人們把这种言論称作“揮舞指揮棒”。
普通的新西兰人，无论是在共产党內，还是在共产党外，都不大
可能接受这种态度。我們确信，苏共领导終于会認識到这种态度
是多么不对，因而在同其他兄弟党举行任何討論时将不采取这种
态度。

我們认为，对一些問題有意見分歧，并不排斥兄弟关系。事實
上，我們同我們的代表团在莫斯科所會見的苏共主要代表的關係
中也沒有发生任何这样的破裂。而且，下述事实也說明了这一点：
在我們两党双边会談結束时，苏共中央委員會代表和我們的代
团签署了一項联合声明，其中还提到将进行进一步考慮和討論。
这是非常受人欢迎的。目前，事情就处于这种情况。

在新西兰，共产党面临着艰巨的任务。正是在这里，在圍繞着
我們自己的党綱展开的活动中，在反对国际壟斷資本越来越厉害
的入侵的斗争中，在反对日益扩大的美帝国主义的影响的斗争中，
在爭取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新西兰的斗争中，实践将证明我們的

意見是正確的。

如果我們全神貫注于在國外進行爭論，以致忽略了我們在國內的經常活動，那將是致命的錯誤。我們的工作就在新西蘭這里。

我們必須把我們的政策帶到工業企業、輪船、矿山和農場中去。我們必須爭取到對這個政策的支持，我們必須使我們的影響越來越大。

帝國主義在世界範圍的衰落給我們黨、給新西蘭工人階級和所有進步人士不斷帶來新的問題。但是，它也為工人階級運動的發展提供了越來越大的機會。

我們這裡反對像殖民制糖公司這樣分布很廣的壟斷資本——這種壟斷資本的活動嚴重地影響了我們的生活水平——的直接鬥爭表明，需要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有正確的思想認識。這種情況同樣適用於這樣一些方面，如我們爭取改善社會保險的鬥爭，爭取較好的教育和改善設備的鬥爭，爭取把稅收負擔加在大企業肩上和減輕工人、農民和其他收入少的人的負擔的鬥爭。

我們在為新西蘭工會運動制定一項更富有鬥爭性的政策而努力，這種努力牽涉到工會運動是朝着階級調和的方向發展，還是依靠階級鬥爭作為主要因素的問題。如果我們看不清資產階級國家的性質，我們就會開始認為，我們的“國家”——一個資產階級的國家——對所有人都是“公平”的。而事實上，它保護的卻是資產階級的利益，而不是工人的利益。它對被剝削者不可能是“公平的”。

這就是我們在這本小冊子里所扼要指出的意識形態對我們有直接影響的方面。

此外，我們還要竭力使那些認為工黨能解決問題的工人和其

他的人認識到，不管有多少工人參加它，工黨今天也是一个支持大企業的政黨，因此是一個資產階級的政黨，而不是一個工人的政黨。我們的這種努力是這場意識形態鬥爭的一部分。重要的是政策，不是人數或名稱。**這也就是我們對待意識形態問題的態度的最重要之點！**

我們爭取和平的立場也是這種意識形態鬥爭的一部分。按照我們的立場，我們說，為了爭取可靠的和平，我們必須努力消灭帝國主義，而決不幫助帝國主義，帝國主義制度本身包含著現代戰爭的根源。

這樣就可以看出這個問題對我們紐西蘭人確實是有很大影響的。

正因為這些情況，而且正因為我們的理由是正大光明的，所以我們直言無諱。紐西蘭共產黨作為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的廣泛的兄弟關係的一部分，不僅有權，而且也有責任表明它的觀點。這是我們為了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利益和為了我們紐西蘭運動本身的前途的利益所應盡的義務。

在馬克思主義運動中，如果發生分歧，應當採用辯證方法來解決。如果照這樣做，那麼就會出現以正確的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為基礎的新的了解和新的團結。這就是紐西蘭共產黨在表明它的觀點時所抱的期望。如果採取這種態度的話，目前的“爭論”事實上會加強我們的整個國際運動。今天，數以百萬計的人正在重新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經典著作，創造性地把它們運用到一九六四年的世界局勢中去。

因此，就我們運動在世界範圍取得的進展來說，我們可以滿懷信心地瞻望未來。我們可以對我們自己的綱領充滿信心，因為我們知道如果我們圍繞它積極展開活動，那末，紐西蘭共產黨的影

响，馬克思列寧主义的影响，就会在工人和受国际壟斷資本剥削的一切人中間日益扩大。

工党领导人在一九三六年宣告来到的虚假的“紅色”曙光已經消失。但是，我們可以像相信明天太阳会升起一样地相信，真正的紅色曙光正在到来，新西兰工人将在新西兰共产党的领导下向着社会主义前进。